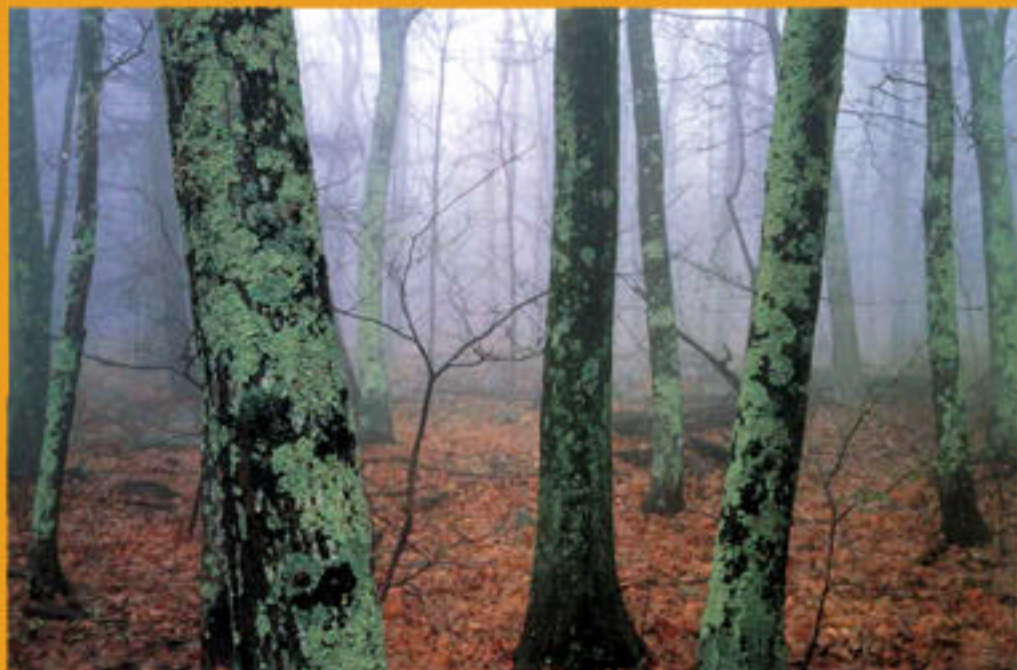


中外名人传记百部

ZHONG WAI MING REN ZHUAN JI BAI BU

梁漱冥传



北京圣碟科贸有限公司制作

中华名人传记

梁 漱 溟 传

XXX 编著

目 录

序.....	004
第一章 特立独行的少年	
一、独特、渊远的家世.....	007
二、一个孱弱的孩子.....	008
三、开明、宽松的早期教育.....	010
四、初入社会.....	013
五、激进于社会主义.....	015
六、两度轻生.....	016
第二章 潜心成佛	
一、归心佛法.....	018
二、执教北大.....	019
第三章 开新儒家之先河	
一、出佛入儒.....	022
二、重释东西方文化.....	024
三、攻击与辩解.....	027
第四章 路漫漫而上下求索	
一、周游讲学.....	029
二、再度从政.....	030
三、着手教育问题.....	031

四、退隐京城.....	033
第五章 开乡治立国之新路	
一、欲替中国开一条新路.....	036
二、对各地乡治工作的考察.....	037
三、参与乡治工作.....	038
四、较为成功的实验.....	040
第六章 投身抗战	
一、论持久战.....	043
二、投身抗日.....	044
三、孔夫子与马克思的对话.....	046
四、为国事奔走.....	049
五、改善兵役运动.....	050
第七章 致力于民主	
一、深入敌后.....	054
二、党派之争与统一建国同志会.....	056
三、劳而无功.....	059
四、组建中国民主同盟.....	062
五、萧墙祸起.....	063
第八章 退隐桂林	
一、劫后余生.....	067
二、再度归隐.....	072
三、再婚.....	074
第九章 内战与和平	

一、重返政坛.....	077
二、召开政治协商会议.....	079
三、去意彷徨.....	081
四、谈判桌前的努力.....	083
五、有第三颗子弹吗.....	090
六、一觉醒来，和平已经死了.....	096
七、最后的努力.....	100
第十章 只发言，不行动	
一、宪政不适合中国.....	107
二、只发言，不行动.....	109
三、畅所欲言.....	112
第十一章 获得新生	
一、由沉默到支持.....	116
二、思想转变.....	120
三、看主席有无雅量.....	125
四、闭门思过.....	132
第二十章 横眉冷对千夫指	
一、众矢之的.....	135
二、思想是烧不掉的.....	137
三、匹夫不可夺志.....	140
第十三章 第二个春天.....	144

序

亚细亚，是一句古闪米特语，意思是“太阳升起的地方”。在这片古老、辽阔的黄色大地上，流淌着一条黄色的大河。黄河偏偏又孕育了一个黄肤色的民族。这是一种多么神秘的自然联系。从此，文明的曙光从亚细亚升起，就像太阳从东方升起。

在黄河的川流不息中，五千年过去了。而这黄皮肤的民族又缔造了多么辉煌的成就啊！尧舜禹汤、先秦诸子、雄汉盛唐乃至四大发明，灿烂的东方文明一精如斯！

然而曾几何时，在西方蔚蓝色文明的坚船利炮下，亚细亚的太阳陨落了。一个曾令马可·波罗惊叹不已的东方大国，一个让欧洲君主惊恐地虚构出“黄祸论”的庞大民族，也曾使不可一世的拿破仑警告西方不要去惊醒的睡狮，却在近代沦落到了任人宰割的境地。

失去了昔日的荣光后，我们分明听到一个古老民族的心在痛苦、在呻吟：难道真的要全盘西化吗？东方的太阳真的陨落了么？

“不，”一个坚决的声音高声喊道，“不会是这样。”在比较研究中国、古印度和西方文明后，他力

排众议、独树一帜，重释东方文化，替孔儒学说辩个明白，并最终断言：“世界的未来将是中国文化之复兴！”

文化界震惊！国人震惊！世界震惊！

人们称他为东西方文化比较研究第一人，现代新儒家的开山，但他却自称是一个佛教徒。的确，古印度佛教给他以悲天悯人的释家情怀，中国孔儒学说则给与他以天下为已任的儒者风范。因此，他不甘心作一个书斋中的学者，而是要为理想的实现周游讲学，奔走呼号。

于是，在辛亥革命时期，他参加京津同盟会，为推翻封建帝制而投身战斗；于是，五四时期，他力排众议，力撑现代新儒家的大旗；于是，在抗战期间，他顾大局，识大体，斡旋于国共两党之间，维持抗日民族统一阵线；于是，在新中国成立后，他不顾个人荣辱得失，敢于犯颜直谏。

“久经风霜情自珍，枯木又逢春。”在东西方文明剧烈撞击、融合的今天，他的名字再次被提起，他的学说又重新得到重视，他的著述陆续付梓，而关于他的研究，评论和传记也渐渐多起来。

他辞世至今已有8年，但他70多年前的视角仍一直支配着后人的思考。他使得东方文明有了包容域外文明的胸怀，他使得中华民族又重新恢复了豁达与

自信，尤其是他那至大至刚、光明坦荡的性格，已不再复见于后辈学者。

他，就是中国最后一代大儒，现代圣人——梁漱溟。

第一章 特立独行的少年

一、独特、渊远的家世

1893年，也就是中日甲午战争的前一年，九九重阳节那天，北京淅沥下着小雨。人们的心情并没有随着重阳这一传统佳节的到来而有所改善，反而像这天气一般由于内忧外患的困扰而更添几分沉闷。但位于安福胡同的梁府上下却是一片欢腾，随着一声响亮的啼哭，一个小生命又降临到世间。梁济虽然已为人父，但仍为第二个儿子的降生而欣喜若狂，并亲自为儿子取名为焕鼎，字寿铭，名取其发达而又为人正直之意，字则表达了平安长寿的祝福。却不想，这两个祝愿日后双双应验，而且这哭声响亮的孩子，将成长为中国现代史上一位惊世的奇才，他便是梁漱溟。

梁府在京城虽不是名门望族，却也是家世渊远。据史书记载，梁氏先祖原姓“也先帖木耳”，是忽必烈第五子和克齐之子。元亡之时，宗室重臣都逃回漠北，但也先帖木耳一系却滞留在河南汝阳。明朝初年，留居中原的元宗室后裔纷纷改为汉姓。也先帖木耳五世成公因为所居之地汝阳属战国时期大梁，取“孟子

见梁惠王”的典故而改姓为梁。梁氏后定居广西桂林。曾祖、祖父、父亲三代都是进士出身，祖父梁承光做京官时移居于北京，父亲梁济做过四品京堂。因此，梁氏融合了蒙汉两民族不同的血，在血缘上富于一种中间性。

同时，梁家原籍广西桂林，但从梁漱溟的曾祖离开桂林后就定居北京，梁漱溟的外祖父张家为云南大理人，但从外祖父离开后也没有回去过。梁家这种南、北方相互结合的情况，使南北方两种不同的文化在这个家庭中相互补充和交融，又呈现出文化的中间性。

像这样一个多方面交融的家庭背景，生活于全国政治、文化中心的北京，又恰逢这样一个变动剧烈的时期，对于造就梁漱溟独特的文化人格和辉煌的成就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一个孱弱的孩子

梁漱溟自幼孱弱多病，气息微弱，往往是还未到天寒，手脚就已冰凉。5、6岁时，又常患头晕目眩症，每次犯病只感觉天旋地转、坐立不稳，必须躺下症状才减轻一些。于是家人担心他日后不会长命，都

十分怜惜他。

7、8岁后，梁漱溟的身体有些好转，便开始同其他孩子一起玩耍，但总是不如别的孩子那么活泼健康。有一次，他见别人盘杠子，觉得十分有趣，就大着胆子试一试，但一不小心摔了下来，躺了几天不断服药才得以康复。从此，梁漱溟就再不敢轻易尝试体育运动。中学时，梁漱溟看见同学们打球踢球十分羡慕，虽然跃跃欲试，但始终不敢上场，只有等大家都不玩之后，才敢一个人上场试一试。

由于梁漱溟幼时虚弱而又不好动，平时又喜欢思考，沉默寡言，神情和气质都不像一个少年，所以儿时的同学都给他取了个外号，叫“小老哥”，嘲笑他的少年老成。

幼时的梁漱溟不但孱弱，而且还有些呆笨。据他自己回忆，他在6岁时，还不会穿裤子。那时的裤子上有一带条，要从背后系到前面并打一个结扣。而梁漱溟却总也学不会，只好让妹妹帮忙。有一天，梁漱溟和妹妹拌了嘴，妹妹一气之下，就没有帮他穿裤子，结果他只好躺在床上。母亲觉得奇怪，问他为什么迟迟不起，梁漱溟十二分委屈地向母亲告状：“妹妹不给我穿裤子。”引得全家都大笑起来。

梁漱溟虽然小时候身体不好，成人之后却很少生病。30岁以后就越发健康。感冒、心脏病、胃病、

脚气等常见病都没有生过。而且精力充沛，为一般学者所不及，这或许与他清心寡欲、注重修养有关。

三、开明，宽松的早期教育

梁家几代都是举人、进士出身，祖母、母亲也都读过不少书，能诗文，因此也算是“书香门弟”“世宦之家”。但颇为奇怪的是，梁自幼接受的却是新式教育，这与其父梁济的为人和开明的思想密切相关。

梁济并没有过人的才思，但天性忠厚，用心细密，十分精明能干，他最过人之处，就在于他意趣超俗，有一腔热肠，一身侠骨。

梁济对梁漱溟十分疼爱，教育方式也开明而宽松，从不轻易打骂孩子，尤其不用体罚。这可以通过一个小故事反映出来。在梁漱溟9岁时，他积蓄的一小串钱忽然不见了，便到处寻问，并怀疑别人，吵闹不休。第二天，梁济在前庭的树枝上发现了这串钱，知道是梁漱溟自己遗忘的。但他并没有声张，只写了一张纸条，写道：一小儿子于桃树下玩耍，偶将一小串钱挂于树枝而忘之，到处向人寻问，吵闹不休。次日，其父打扫庭院，见钱悬树上，乃指示之，小儿始知其糊涂

云云。并将纸条交给梁漱溟，梁漱溟看后马上省悟，自知不对，反而更加惭愧。

1898年，6岁的梁漱溟开始发蒙读书。梁济请了一位孟先生到家里教授，学的是地球韵言和世界大势，内容主要是欧巴罗、亚细亚、太平洋，大西洋之类，对于四书五经却从来没有诵读过。第二年，北京有了第一个洋学堂——京西小学堂，梁济就送梁漱溟入学。学校既学英文又学中文，很合梁漱溟的心性，可惜两年后发生庚子之变，八国联军入侵北京，而义和团又专杀信洋教、读洋书之人，学校被迫关门。梁漱溟只好将《英文初阶》、《英文进阶》等课本一齐烧掉，休学回家。

1901年，9岁的梁漱溟休学两年后转入南横街公立小学堂读书。第二年又转入蒙养学堂读到11岁。12、13岁时梁漱溟回到家中，由梁济联合几家亲戚的儿童，请一位刘讷先生任教。13岁下半年到14岁上半年，梁漱溟又转入江苏小学堂念书。

1906年，梁漱溟考入了顺天中学。尽管只有14岁，但他的性格行径却已十分古怪。他有一种夸大狂的心态，总想做伟人，由他一个人来承担国家大事。梁漱溟在班上年龄最小，但学习并不落后。他很少看中国旧书，国文讲义照例不看，国文课照例不听，但作文成绩却时常被取为第一名。他尤其喜欢作翻案

文章，不落俗套，有时能得到先生“语不惊人死不休”的称赞。但有时却不为先生所喜，获得“好恶拂人之性，灾必逮夫身”的评语。由此可以看出少年梁漱溟的反叛性格。

在顺天中学，他还遇到了一位人生导师——郭晓峰。郭晓峰仅比梁漱溟大两岁，性情也十分古怪。容貌姣好如同女子，见了他的人都惊叹于他的美丽。郭天份极高，思想超脱，学问渊博，在交往中对梁思想启发很大。梁对他十分崇拜，尊称他为郭师，一有空就去请教，并专门准备了一个笔记本记录郭的谈话，名为《郭师语录》。一些同学都讥笑他们，称他们为“郭圣人，梁贤人”。

1911年冬，梁漱溟完成了五年半的中学学业，步入社会。

梁漱溟的早期教育前后经过了两个私塾、四个小学和一个中学，但是都断断续续无法循序渐进。他主要是靠自学成的才。

由于特殊的家庭环境和社会关系，使他有机会接触到大量的报纸杂志，如《启蒙画报》、《京话日报》都是他小学时代很好的课外读物。尤其是前者，使他受益很大，差不多天天读、期期看，从中不但得到了许多知识，而且启发了思想。到中学时期，他则经常阅读《国风报》、《民主报》、《北京日报》、《帝国

日报》等大量报刊杂志，收集了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整三年6大本和《新小说》全年1本，反复阅读，受益良多。因此，少年梁漱溟谈起时局来滔滔不绝，头头是道，而不像一名中学生。

梁漱溟善于学习又长于思考，有两个问题时常困扰着他，一个是人生问题，另一个是社会问题。对于前一个问题的探索使他出入于西洋哲学、印度宗教和东方儒学之间，成为一名著名学者；而对后一个问题的探索，使他中学时就参加了中国革命，投身于社会运动之中。据梁漱溟自己回忆，他在14岁左右，就有了自己的人生理想和价值标准，并且日趋完善成熟。这不能不归功于他独特的早期教育。

四、初入社会

对于人生问题的苦闷，使梁漱溟时常沉溺于深思之中，但内忧外患的现实却使他对于社会问题更加关注，因此，中学还未毕业，他便进入社会，投身于革命之中。

初入社会，他和立宪派和革命派都有接触，但起初，他更倾向于立宪派。

据梁漱溟回忆，梁启超是他儿时最崇拜的人物之一。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特别是其所著的《新民说》、《德育鉴》以及立宪派与革命派论争的文章对梁漱溟思想产生了很大影响。梁启超在《新民说》中一面提出了新的人生观，另一方面指出了中国社会应该如何改造，而这恰恰符合梁漱溟精神的需要和思想倾向。同时，梁启超等维新派在报刊上大量介绍西方近代思想，也使梁漱溟得以领略近代西方思想。而梁启超关于周秦诸子以及明清大儒的许多论述，意趣新颖，笔调健劲，十分感人，不论在思想上还是生活上都给少年梁漱溟很大的助益。

梁漱溟不仅钦佩梁启超的学识，而且坚信康、梁等维新派的君主立宪的处方是医治中国问题的灵丹妙药。基于此，当时的梁漱溟仅仅热心社会改造，以英国式的君主立宪制为理想，应该归于立宪派。

然而腐败的清廷一天天失去人心，立宪派不但无法阻止这一趋势反而在革命派的进攻上捉襟见肘，难以自圆其说。在这种情况下，不少立宪派纷纷转向革命派，梁漱溟也不自觉地转变着。特别是他遇到了十分激进而又善于交际的革命派甄元熙，使他渐渐感到立宪无望，而革命才是唯一的出路。

1911年，梁漱溟经甄元熙介绍加入了京津同盟会，并剪去了清朝顺民标志的长辫子。从此，梁漱

溟进入了革命党人秘密而令人兴奋的世界。这里充满了暗杀、秘密会议、军火走私和制造炸药，作为一名年仅18岁的中学生，他成了自己生活的主宰。他一次到北京近郊的昌平进行了秘密的革命活动。此后，又多次去天津总部领取枪支弹药。他受支部委托，在东单二条开卫家煤店，作为革命党人在北京的活动据点。梁漱溟十分喜欢这类活动。他后来回忆道：“我们的工作一面好像很凶，玩手枪炸药的把戏，同时也儿戏得很，并不知道其中的轻重关系。”

1911年，梁漱溟中学毕业，同时辛亥革命也爆发，梁漱溟便加入《民国报》，主要担任外勤记者。当时，梁漱溟在北京新闻界相当活跃，上至总统府、国务院，下至学校团体、街头巷尾，无处不去，目睹了风云诡谲的政情。1914年，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民国报》也就成了国民党的机关报，国民党总部派议员汤漪负责。梁漱溟在坚持工作一段后，就和朋友一道退出了《民国报》。

五、激进于社会主义

在《民国报》工作时，梁漱溟一日在家中闲极无

聊，就整理旧书，不曾想在旧书堆中找到了一本日本人大幸德秋水所写的《社会主义之神髓》。这本书是光绪三十一年版，已经十分陈旧，但基本表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主要观点。梁漱溟对于书的内容并不十分感兴趣，但其中的一些反对私有财产的话，却深深打动了他的心。从此，他便开始思考这一问题，最终把他引到反对私有财产的道路上。

梁漱溟当时对社会主义了解得并不深刻，但他认为私有财产是社会上一切痛苦和罪恶根源，强烈地反对，因此对社会主义也十分热心。1912年冬天，他将自己思考的心得写成《社会主义粹言》，并油印了几十本，分送给亲友。但那时梁漱溟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很狭猛，只是从人生理想方面考虑，即认为人类生活需要社会主义的某些合理成份。但在中国问题上，却不相信社会主义能救中国。

六、两度轻生

辛亥革命的胜利曾给梁漱溟以成功的希望，但革命只是从形式上推翻了封建帝制，政局并未因此而好转起来，国家却又陷入了军阀混战的团境中，连年战

祸、民不聊生。这不由使梁漱溟十分失望，而通过两年多的社会经历，使他对于“革命”“政治”“伟大人物”有了更深的了解，觉得不过如此。有些“伟大人物”的下流行径、鄙俗心理，以及尖刻狠毒之事，以前在家庭、学校都不曾见过，不由对社会心生厌倦。

在致力宣传社会主义之后，使他更深了解了百姓的疾苦，对于社会上的尔虞我诈、腐朽淫糜更是深恶痛绝，甚至产生了悲观厌世情绪，曾两次想自杀，幸好都被朋友救起。

第一次轻生发生在南京下关，梁漱溟和一位朋友住在江边第一楼。当时的下关非常繁华，他的房钱是一天一元五角，饭还在外，这种奢华的生活使他很不情愿，甚至有罪恶感。并且举目都是些难堪的景象，而且笙歌盈耳，无法入睡。梁漱溟只觉得异常烦闷却说不出话来，冲动之下便决定自杀，幸亏朋友发现得早，方避免了一场大错。

第二章 潜心成佛

一、归心佛法

现实的黑暗使得梁漱溟对社会问题厌倦了，转而热心于人生问题。并且他在自杀得救之后顿悟，觉得多年的思索终于豁然开朗。从此，他在人生观上发生了重大转折，由一位热心的革命青年转变成虔诚的佛教徒。

梁漱溟在少年时期受父亲梁济的影响，倾向于以实用作为是非标准。但有一天，他看到家里的女佣整天洗衣做饭，十分辛苦，便问她觉得生活怎么样，女佣却回答习惯了。而他反顾自己虽然深受家人宠爱，学业又较顺利，内心却十分苦闷。从此，他开始转入了苦与乐的研究。经过反复思索，他认为人生的苦乐不在于外部环境，而在于内心，在于人的主观世界，由于人的欲望是无止境的，这山望作那山高，从而人生唯是苦。

基于这样的认识，他在14岁时，就开始阅读佛经，并且暗生出家之念。17岁时，他母亲久病不起，自知不久于人世。而梁漱溟的长兄虽然结婚10年却

仍没有孩子，因此希望梁漱溟能早日完婚生子，为梁家续一脉香火。但当时梁漱溟已潜心佛法不愿结婚。梁济虽然和妻子想法一样，但尊重儿子的选择，不愿强迫他。于是在梁济的默认下，梁漱溟拒绝了父母为他订婚。并从20岁开始，研究佛经，遵从佛家戒条，开始吃素，已经显露有出世为僧的想法。

离开《民国报》后，梁漱溟经常去琉璃厂文明书局、有正书局翻阅购买南京金陵刻经处出版的佛经以及上海狄葆贤主编的《佛学丛刊》。久而久之，对于晦涩难懂的佛经有了较深的理解。

除了学佛之外，梁漱溟又潜心医道。他不喜欢靠募化为生的僧侣生活，希望靠医术而换取衣食，同时又能拯救芸芸众生。于是他购买了大量中医古籍和西医书籍，刻苦钻研，都有相当的造诣。他还希望能沟通、融合中西医学，大有大彻大悟、济世救人的释家风范。

二、执教北大

在对人生问题连续几年的探索之后，梁漱溟将自己的心得写成了《究元决疑论》一篇长文，并在19

16年的《东方杂志》上连续刊载。文章中，梁漱溟融贯东西方哲学，但主要根据印度佛教的观点探讨了世界本源和苦乐问题。文章的发表在社会上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并为他在学术界带来了广泛的声誉。

1916年冬，蔡元培接任北京大学校长，采取“兼容并收”的方针，网罗各种人才。于是，在教育总长范源廉的介绍下，梁漱溟带着《究元决疑论》慕名去见蔡元培。蔡对他的学识十分欣赏，并希望他能到北大教书。对此，年仅24岁并且并无高学历的梁漱溟自然十分愿意。但当时，梁漱溟正担任司法总长张耀曾的机要秘书，只好与蔡元培商定暂缓到北大，课程由梁漱溟推荐许季上暂时代为教授。

不久，府院之争爆发，北洋政府改组，梁漱溟也因家事而辞职南下。在途中，梁漱溟亲眼目睹了军阀混战给人民带来的苦难，感慨之余写下了《吾曹不出如苍生何》的小册子。到北京后，自费印了几千册，四处分发，呼吁各方成立国民息兵会，无条件停止内战、重建和平。当然，这一呼吁在当时是毫无结果的。

梁漱溟回到北京时，正赶上许季上生病。于是在蔡元培的一再催促下，梁漱溟于1917年10月，正式到北大任教。就这样，仅仅中学毕业的梁漱溟却在当时中国的最高学府开始了自己的教学生涯。

梁漱溟在北大主讲印度哲学。他来时就曾公开声

明：“此来除替释迦、孔子发挥外更不做旁的事。”梁漱溟到北大的第二年，就根本更改了许季上的讲义，编著《印度哲学讲义》，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

梁漱溟讲课深入浅出，说理透彻，见解精到，常发人未发之言、决人未决之疑，因而深受学生欢迎。后来成为一代宗师的冯友兰就是他此时的学生。他所讲的《印度哲学概论》与胡适的《中国哲学史》、马叙伦的《老庄哲学》被誉为北大哲学系的“三架车”而并驾齐驱。

第三章 开新儒家之先河

一、出佛入儒

梁漱溟在北大任教期间，正是新文化运动蓬勃兴起之时。特别是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西方近代思潮如潮水般涌入中国，举国上下全力讨伐传统文化，打倒“孔家店”的呼声愈来愈高。而另一方面，传统文化的卫道士们也摇旗呐喊，奋起反击，新旧文化斗争得异常激烈，北大正处于斗争的中心。

梁漱溟对于新思潮并不反感，但这样的环境对他继续宣讲古印度哲学形成了很大压力，特别是对于传统文化全盘否定或完全继承的态度都无法令他信服。于是，他开始从人类发展史的角度研究中国、印度和西方三大文化体系，并试图寻找到中国乃至世界文化未来的发展方向。

1918年10月31日，梁漱溟在《北京大学月刊》上刊登启事，征求研究中国文化的合作者，结果无人响应。但他并不气馁，11月起，梁不辞辛苦，每星期开讲“孔子哲学之研究”，大力宣扬孔子的儒家思想。这正应了他初到北大时的声明，除替释迦说

法外，又要替孔子说个明白。

很明显，梁漱溟此时已由先前的佛教出世思想而改为儒家的入世人生观了。这是他人生的大转折。据他自己回忆，促使他转变的根本原因却是情感的需求。

那是在1920年春，梁漱溟应少年中国学会邀请就宗教问题发表演讲。回到家后，他准备补写演讲词。这对他来说本来是件极其简单的事。但不知为什么，他下笔时总觉得文思枯涩、头脑紊乱，没写几行，就涂改满篇，实在写不下去。他只好搁下笔，随手拿起一本《明儒学案》翻阅，想平静一下心情。当他翻到《东方语录》看到“百虑交铄，气血靡宁”八个字时，不由心中猛地一惊，感觉这句话说的正是现在的自己，顿时头皮冒汗，默然自省，当时就放弃了出家的念头，下定了出佛入儒的决心。这种改变最根本的标志就是他决定结婚。然而，对于他来说，追求婚姻的幸福是一种道德的需求。他曾写信给朋友说，自己结婚是出于美德的爱好，而不是男女间性的吸引。当梁作出这一决定后，他的朋友伍伯庸就把他介绍给了自己的小姨子，一个年轻的满族寡妇，名叫黄靖贤。黄并不聪明、漂亮。而且不会做家务，但梁漱溟还是于1921年冬天和她结了婚，从此，他就由虔诚的佛教徒的生活方式改变为儒者的生活方式，但却一直

坚持清心寡欲，不食荤腥。

二、重释东西方文化

自中西方通交以来，西方文明就以各种途径传入中国，特别是到了清末，帝国主义以其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使得国人不再妄自尊大，不得不放下天朝大国子民的架子，开始关注西方文明。

中国现代化过程就某种意义而言就是西化的过程。中国向西方文明的学习大致历经了“器物层面”到“制度层面”再到“文化层面”一系列过程。当时，人们已认识到中国问题的解决，必须由文化入手，如果只停留在枝枝节节的斩伐，则于事无补。

在当时的中国，对文化问题大致存在三种意见。以陈独秀、胡适为首的革新派主张根本抛弃传统文化、根本改造民族精神，走全盘西化的道路。这一意见由于过于激进而无法获得国人的全力支持，必然引起另一种反对意见。一些顽固的守旧派如辜鸿铭则极端地反对文化的任何变革，他们认为中西文化是完全不同的文化体系。当西方人还在茹毛饮血时，中华民族就已经开化了，西方文化决不比东方文化优越。故而中

华民族不应抛弃传统，相反，应完善和发展她。

第三种意见则是调和说。梁启超周游欧洲，看到了西方科学发展偏执而带来的一些负面效应，听到了不少西方人对科学的反感和对东方文明的羡慕，从而认为东西方文化应该相互融合、取长补短，未来的世界将是二者互相结合产生新文明的世界。美国著名哲学家杜威，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对此意见持赞成态度，并于“五四”前后亲赴中国大力宣扬，吸引了不少赞成者。

三方面意见的支持者都认为自己所说的就是真理，各执一端，争执不下，莫衷一是。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原来无心卷入的梁漱溟再也忍不住了，如鲠在喉，不吐不快，他决心将自己的见解贡献给国人，于是不自觉地参加了这场东西文化的大论战。

在他看来，以辜鸿铭、林琴南为代表的旧派实在不是陈独秀等新派人物的对手。“旧派只是新派的一种反动，他并没有倡导旧化……他们自己思想内容异常空乏，并不曾认识了旧化的根本精神所在，怎能禁得起陈先生那明晰的头脑，锐利的笔锋？旧派之所以败阵，吃亏吃在‘思想异常空乏’上，可见仅仅固守前人的成说实属不智。”基于这种观点，他努力从西方现代资产阶级哲学中寻找可资利用的材料和思想方法，通过中西文化的比较研究的途径显示传统文化的

长处，使儒学复兴。但他又不同意梁启超的折衷方案，认为他没有说出东西方文化为什么调和和怎样调和而断定其结果为调和必然是错误的。梁漱溟主张在旧传统的基础上进行自我的更新才是中国文化的前途。这样，他就开辟了新的治学方向，即现代新儒家哲学。

1920年秋，梁漱溟在北大发表了《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的演讲，阐述自己的思想。第二年，他又应王鸿一的邀请到济南山东教育厅讲解同一题目。

1922年，他的学生罗常培、陆政根根据这两次讲学的记录和梁在《少年中国》杂志上发表的《宗教问题》一文整理成书，以《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的书名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

这部巨著的出版标志着他的新儒家思想业已形成，在学术界引起了广泛而持久地影响，褒贬不一。称赞他的人认为这是东西方文化比较研究的开山之作，而诋毁他的人则认为梁是封建主义的卫道士，满纸都是保守腐朽的思想。一时间梁漱溟成为当时学术界最有争议的知名人士。

三、攻击与辩解

《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的出版，使得梁漱溟“暴得大名”，也给他带来了广泛的争议。从评论的情况看，许多人对梁的思想并不真正理解而妄加评论，有的评论则干脆和梁著是两码事。对于此，梁漱溟虽然气愤但一概泰然处之，不愿辩解。原因主要就是这些批评往往不着边际，不能引起他辩驳的兴趣。

然而1923年，胡适在《读书杂志》上发表了《读梁漱溟先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长篇文章后，梁漱溟忍不住写了封信给胡适，除表示感谢外又指责胡适文中言语刻薄，攻击性太强。胡适收信后立即回信解释，说自己行文往往喜欢在极庄重的题目上说一两句滑稽话，借以增强文章的辩论效力，请梁漱溟谅解，于是两人的不快暂告结束。

不料过了半年，胡适在所作文章中又旧事重提，再加上陈独秀也撰文公开奚落梁漱溟，这不由激怒了十分自尊、十分认真的梁漱溟，迫使他不得不起而反击，著文辩驳。

仅从感情上说，胡适、陈独秀把梁与张君勱并列，归为守旧的一派，视为思想革新运动的“障碍物”。

这使梁漱溟感到很委屈，他认为他同胡适、陈独秀都是难得的好朋友，尽管见解不同但也差不多，应该算盟友，他把自己归为新文化运动的右翼。对于胡适的批评，梁漱溟并不心服，以为胡适并没有真正弄懂《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所论及的问题。因此不客气地请胡适用心看一看原书。他对胡适的反击并没有多少新话，只是以嘲弄的语言指责胡适信口诬人。

第四章 路漫漫而上下求索

一、周游讲学

梁漱溟自以为解决了人生问题后，不愿再做一名书斋中的学者，为了宣讲自己的见解和主张，他东奔西走，四处讲学，俨然如先儒孔子，周游各地而传道、授业、解惑。

1922年1月，梁漱溟应邀来到山西，作了一系列演讲，大到宇宙人生、民族命运，小到个人生活经验，无所不包，大力宣扬自己的文化思想和政治主张，一方面想教化人民，改造民族精神；另一方面，也希望能找到支持者。

从山西返回之后，他又前往山东、河南各地宣扬自己的思想。他认为：中国首先要看清国际的大环境和国内的小环境，明白中国目前所处的地位。中国之所以沦落到目前这种地步，根本原因在于文化。东西方文化走的根本不是一条道路，中国的问题在于文化的早熟和近几十年对西方的简单模仿，结果是丢了传统而新的文化体系又无从建立。中国如想获得根本性的改变，则必须从传统文化着手，但对西方人的成功

之处必须加以借鉴。这样既能造就完善的人格，又能发现避免西方现代化后的社会弊病，从而奠定我们的国家。

二、再度从政

周游讲学并没有达到梁漱溟预期的效果。他虽然大力宣扬，但应者寥寥，使他不免有曲高和寡的失落感。这不由唤起了他对政治问题的关注。于是，在讨论文化、人生问题之余，他再度热衷于政治。

他继承了历代先儒的观点，认为作为知识分子，应该各司其职，所谓“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既不能在政治清明之时一拥而上，刺激政治过于急速地发展，也不能因形势突变而对政治敬而远之，过和不及都是中国知识分子应极力避免的毛病。

针对当时军阀割据、内战不断的政治局面，梁漱溟认为除了国民不争这一最大过错外，主要在于军人干预政治，他认为，在现代社会条件下，军人必须远离政治，政治家也不能凭借武力和军队去维持法律和秩序，更不能以军队作为政治斗争的手段，

1922年直奉战争爆发。看到民不聊生的局面，

梁漱溟痛心不已，便和李大钊，蔡元培等人发起裁兵运动，并由蒋方震草拟了《裁兵计划》呼吁全面停止内战、废督裁兵、化兵为工、重建和平。

1922年5月21日，胡适、梁漱溟等十多人又共同发表了《我们的政治主张》，提出组建一个好政府，为社会谋福利。

梁漱溟等人的政治主张虽然不无道理，却不足以感动手握兵权的军阀。这种温和的改良主义想在不触动军阀政权的基础上建立“好政府”、正当机关，宪政政府，无疑是以虎谋皮，无法产生实际有益的效果。

三、着手教育问题

梁漱溟自己也明白他的政治主张不会有什么结果，便又重新回到了文化问题上。因改造文化必须由教育入手，于是1922年秋，他在上海《中华新报》宣布，今后将致力于教育问题。

梁漱溟对于教育问题的思考由来已久，在过去的文章和演讲中多次提到，只是缺乏系统的表述。他认为中国的传统教育方式偏于意向，讲的多是君子之道，而西方则注重知识的传授。因此中国必须吸收西方教

育的长处。但知识只是教人以方法，授人以工具，对生活起一种辅助作用，做人却是教育的根本。反观当时国内的教育现状，他认为教育改革走得太过，只是刻意模仿西方，忽略了心理和生理各方面协调。他主张教育应着眼于一个人的全面生活而领着他去走人生之路。为此，作为教育者，必须和受教育者结成亲密的朋友关系而去影响、指导受教育者。

基于这一教育思想，梁漱溟在1921年赴山东演讲时就提议在曲阜创办一所新式大学，并着手于筹备工作。在他的努力和朋友的帮助下，筹备工作进行得比较顺利，先后募集了公私捐款数万元，并在曲阜东南二里选定了校址。

但这些对于办一所大学无异于杯水车薪，梁漱溟面临着两大难题，一是经费，一是师资，同时，生源和办学经验也困扰着他。无奈之下，梁决定先办一所中学和一个学会，然后再实现创办大学的目标。

经过与政府的协商和朋友的多方努力，梁漱溟选定山东第六中学即曹州中学试办高中部。现在办曹州中学的同仁将作为日后办曲阜大学的同志，而曹州高中自然成为未来曲阜大学的预科。

1924年夏，曹州高中正式成立，第一届招收两个班共80人。梁漱溟根据有教无类的办学思想，并不规定收费标准，学生家长有钱的多出，没钱的少

出，希望由此替教育界开出一条新路。

在开办曹州中学的同时，梁漱溟还在曹州开设了重华书院，培养各类专门人才，为将来创办曲阜大学作准备。

四、退隐京城

1925年春，梁漱溟带着懊恼和沮丧回到北京清华园，谢绝了一切外务后，静心整理父亲梁济的遗稿。

对于这次山东办学的详情，梁漱溟再也没有提起过，不过懊恼之情却形于言表，可见一定十分的不顺利。他宣称三年之内不再接受任何邀请或聘任，而要潜心钻研学问，等有所长进之后，才出来做事。

在最初的一段时间里，梁漱溟完成了自己长期的夙愿：将父亲梁济的遗稿编为《桂林梁先生遗集》，又撰写了《年谱》和表达忏悔之心的《思亲记》，叙述了自己的种种不孝言行，求得内心的解脱。

1926年春，梁漱溟和几个最信任的弟子来到北京西郊的大有庄，租了间民房讲学，主要是讲解自己一直思考的《人心与人生》问题。这段时间的潜心

钻研，使得他的新儒学更加成熟和完善。

但由于坐吃山空，梁漱溟往日的积蓄已经所剩无几。为了解决生活问题，梁只好放弃了暂时归隐的初衷。1927年，他应北京大学哲学系同学会的邀请，就《人心与人生》问题作了一系列长篇演讲，阐述了自己归隐后思考的心得。于是在隐居两年之后，梁漱溟又回到社会。

梁漱溟此次退隐京城，是他一生中最苦闷的时期，这种苦闷除了个人的不幸与困难外，更多则是因为他看不清中国的出路而茫然若失，找不着方向。

第五章 开乡治立国之新路

一、欲替中国开一条新路

正当梁漱溟陷于苦闷而找不到出路之际，南方一种新兴的民族自救运动开始了，这就是1924年的国民党改组和国共第一次合作。这时，李大钊从广东归来，欣喜地向梁谈了国共合作的意义和国民革命的局势，给梁以一线希望的曙光。1925年，革命形势更为乐观，广东局面渐趋统一。梁漱溟的许多朋友都投身革命之中，同时纷纷劝说梁也离开书斋，到社会上感觉那清新、活泼的时代气息。

但梁漱溟却拒绝了，因为他还没有在思想上解决自己的问题，不甘心就这样盲目地投身社会。但如火如荼的广东国民革命运动也感染了他，使他无法再关上房门，高谈哲学与人生。于是，1926年初，他派弟子王平叔、黄艮庸、徐名鸿等前往广东实地考察。不久，王、黄等人返回将一路所见所闻所感向梁作书面报告。梁漱溟只觉得几年来困扰于心的云翳一扫而光，从此对一向怀疑但不能断然否定的“西洋把戏”彻底放弃，对中国传统的立国之道更加坚信。经过这

番考察论证，他相信自己已经找到了中国的出路，那便是乡治立国。

对于乡治问题，梁漱溟早有所思考。早在1923年春，他在曹州中学讲演时，就已经提出“农村立国”的说法，只是没有系统论述，同时对于此观点又不敢断然肯定，一直在苦苦思索。直到1927年，梁漱溟才消除疑虑，并准备就此干出一番事业。

1927年5月，梁漱溟偕王平叔、黄艮庸南下，首先在上海会见了陈枢铭，畅谈了自己的主张之后，便应李济深之邀到了广州。

李济深此时在广东兼任总参谋长与总司令之职，属于实力派，和梁也是老朋友，他基本接受梁的主张，同意在广东试办乡治。梁于是决心留在广东，并代表李济深担任广州政治分会建设委员会主席，不时参与李的其他政治事务。

在广东不到两年的时间，是梁漱溟乡治建设理论发展的重要时期。1928年，他曾在广东试办了一期乡治讲习所，分十次连续讲演乡治问题，影响较大。但至于乡治的具体事务，却得不到政府的有力支持。梁漱溟感到时机不够成熟，于是主动要求先到各地考察乡治工作的情况。

二、对各地乡治工作的考察

梁漱溟乡治理论的提出，除了与他思想发展一脉相承外，不能说他准确把握了时代的脉搏，确实找到了中国问题的症结所在。

以农村为突破口解决中国问题，是当时社会各界的共识，但各派的主张和具体措施都不同。1929年2月，梁漱溟带着冯炳奎、周用、马毓健、伦国平等一行人离开广东北上，参观考察沿途各地乡治工作的实况。首先抵达南京晓庄师范。

晓庄乡村师范学校是陶行知于1927年3月创办的。他奉行儒家教育思想，教与学、知与行合一，和梁漱溟不谋而合。因此两人初次见面就很相投，相谈甚欢。在参观之后，梁漱溟对陶的事业十分钦佩，提出向他借兵调将。陶行知欣然同意，当时就介绍潘一尘、张宗麟、杨效春给梁漱溟认识。这几人后来都成为梁漱溟在山东乡建学院的得力助手。

随后，梁漱溟又考察了中华职业教育社主办的江苏昆山安亭乡徐公桥试验基地、晏阳初主办的河北定县翟城村试验区 and 山西省的乡村建设情况，并和阎锡山会晤，畅谈了自己的乡治理论和对山西村政的意见

建议。

1929年初，梁漱溟结束了对各地乡村运动的考察，回到北京。一路的所见所闻使他的乡治理论更加成熟，他认为各地所进行的乡村建设都大小不同地存在种种问题。主要是只注一时一地而缺乏长远的考虑和全局观念，中国问题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解决问题必须由全局入手，统筹安排，协调并进。因此，围绕中国之一问题的观点，逐渐形成了他独特的乡治建设理论。梁漱溟希望能将自己近年来的心得写成《中国民族之前途》，从政治、经济和传统文化几个层面分析中华民族的前途，指出乡治是中华民族的唯一出路，并提出自己乡治的理论和具体措施。但由于种种原因，他当时并没有完成，只是以单篇的形式单独发表了一些观点。

三、参与乡治工作

30年代中期的河南由于连年内战而民不聊生，有志之士纷纷发起“乡村自卫”、“乡村自救”运动。

1929年7月，省政府决议，责成彭禹庭筹办河南村治学院。经王鸿一介绍，彭找到了梁漱溟请他帮忙。

梁正想将自己的理论付诸实践，于是很高兴地答应下来，从此真正参与到具体乡治工作中。

1930年1月，河南村治学院在辉县百泉正式成立。从师资方面看，该学院除了梁漱溟外，还有研究合作的孙廉泉，研究农业的冯梯霞，可以说汇集了当时全国村治派的名流。他们通力合作，精心研究乡治建设的理论和具体运作方式，使得村治学院声名大盛，河南，山东，山西各省的求学者络绎不绝。1930年5月，冯玉祥在王鸿一的陪同下，专程来学院参观，并发表演讲称赞他们的工作。

梁漱溟在学院担任教务总长，学院的一切章程、方针和办学方向都由他提出、制定。他还同时担任了乡村自治组织等课程的讲授工作。

正当河南村治学院顺利发展的时候，中原大战爆发，河南成为蒋介石、冯玉祥的主战区，学院开办仅一年就被迫结束了。但学院却为乡村建设运动培育了力量，传播了种子，遍布各地的学生为社会的发展做出了一定贡献，因此，在中国现代教育史上占有一定地位。

在任职河南村治学院的同时，梁漱溟还接受了《村治月刊》的聘任，担任主编。1930年6月1日起正式负责出版了新编第1期第1号，并且决定从此改为半月刊。

梁漱溟与王鸿一为代表的北方村治派存在一定分歧，他不认为乡治是自上而下的建设事业，而认为是一种自下而上的文化运动，因此不同意王鸿一的依靠现政权和地方军阀的观点，但在实践过程中，他却又不得不依靠像韩复榘这样的地方实力派。

基于以上认识，梁漱溟在接办《村治月刊》后，修改了部分办刊方针，主要针对青年尤其是左倾青年说话，发表了一系列从文化哲学、社会分析等角度的研讨乡村建设的文章，逐步建立、完善并宣扬自己的乡治理论，在国内外引起了很大反响。

四、较为成功的实验

1930年，韩复榘调任山东，河南村治学院难以继。在韩复榘的支持下，学院迁往山东并改名为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

1931年6月15日，乡村建设研究院在邹平县正式成立。院长为梁仲华，梁漱溟任研究部主任。

研究院设有研究部、乡村服务人员训练部，邹平实验县、农场、社会调查部、医院卫生院和图书馆等。

研究部的设立是为了普遍地倡导乡村建设研究，

为学术界开风气并研究具体的建设方案。乡村服务人员训练部是为了训练乡村工作人员，并且下设服务人员指导处，安排导师到各县巡回指导工作，解决实际问题。社会调查部负责实地调查工作，并编写各地乡治状况的书籍。

农场所做的工作主要是培育优良品种并大力推广，从而提高农村技术与生产力水平。从1931年8月到1934年12月，他们把波支猪与本地猪交配，得到优良猪仔，每头比本地猪多长肉50斤，而杂交得到的优良鸡年产蛋170枚，数量超过本地鸡一倍。此外，农场还研究乳牛、乳羊的饲养法和蜜蜂的养殖，收集、培育优良棉花、小麦、大豆品种，加以推广。为乡村建设做了实际有效的工作。

1931年，邹平实验县在研究院指导下进行改革，废除了原有的7区157乡镇，按人口、自然环境、风俗习惯等，划分为14乡366村，设立乡学和村学，作为行政机关和教育部门。在乡学、村学之外，邹平还推行短期义务教育，利用在学的优等生来教育失学儿童。

乡学的主要事业是进行乡村自卫训练，维持地方安宁与秩序，对民众进行组织纪律教育，灌输民族意识。

在经济方面，乡学、村学主要是指导农民进行乡

村合作事业。从1931年到1936年，邹平成立了棉花运输、蚕业产销、林业生产、信用庄仓、购买、机织等6种合作社，共计307所，社员8828户，股金12422元。1933年8月，邹平县成立了金融流通处和农村信用社，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农民的资金问题，促进了农村金融流通和商业活动的发展。

1933年7月，研究院开办了民院，次年11月又成立了卫生院，普遍开展预防保健工作，提高农村的医疗卫生条件。

可见，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在梁漱溟等乡治派的积极努力下，切实而有效地开展乡村建设工作，为乡村的发展乃至中国问题的解决开了一条新路，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有益的借鉴，可以说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第六章 投身抗战

一、论持久战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国难当头，民族危矣，举国上下都人心惶惶，有志之士则致力于抗日战争的宣传准备工作。对于抗战问题，国内明显存在三种倾向。一派是激进的左翼人士，主张速战速决论，希望中日马上全面开战。一派是以蒋介石为代表的政府稳健派，他们虽然外交上态度强硬，但实际不愿扩大战争，对于抗战结果持悲观的态度。还有就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认为抗日战争将是一场持久战，但必定以中国的胜利而告终。

梁漱溟对于战争的分析与毛泽东不谋而合。他认为，悲观主义和速胜论都是应避免的有害情绪，中国只能凭借广阔的疆土和广大的人民，靠旷日持久的战争来拖垮日本帝国主义并最终战胜它。为此，梁在抗战全面爆发前就提出两项基本原则，一是必须发动民众，充分运用蕴藏在民众中的无限兵力和巨大力量；二是不能有速战速决的侥幸心理，而必须树立持久战的观念，争取最后的胜利。

为了实现这两项原则，梁漱溟提出从两个方面加以准备；首先要加强政府的统治力量，即必须能得到广大民众的信任和支持。其次，必须增强国民的抗敌情绪和能力，大力宣扬民族精神和加强对民众的组织训练。

在梁漱溟看来，中日双方由于各自国内的问题和国际形势，不会在近期内开战。因此，他作了一系列冷静而长远的设计，主张抗战应该有条不紊、按部就班地进行。

但形势的发展并不如梁漱溟所料，在国难当头的非常时期，当务之急应是组织青年共赴国难、保家卫国。梁的主张虽然有一定道理，从长远看更有合理之处，但也过于保守，只能激起爱国青年的反感，落了个阻止青年抗战的骂名。

二、投身抗日

形势的急转直下证明了梁漱溟对开战时间的估计是错误的。1937年7月7日，日本军队在卢沟桥向中国军队发动了进攻。从此，中日战争全面爆发。

结果虽然是梁漱溟始料不及，但他立即做出了自

己的选择，放弃了先前从乡村建设入手逐步解决中国问题从而达到战争胜利的主张，着力于思考如何迅速动员民众积极投身抗战。

8月初，梁漱溟前往上海与蒋方震会晤，就抗战的有关问题交换了意见。由于形势危急，他仅在上海停留3天就于11日返回山东。

8月13日，松沪会战爆发，日军已打到了上海。国民政府邀请各党派在野的知名人士组成国防参议会，作为战时最高咨询机关，梁漱溟也在内。梁漱溟接到电报时刚下火车，他顾不得休息，当时就乘原车取道兖州奔赴南京。14日清晨，他赶到南京并和张群、熊天翼等人会晤。8月17日晚，国防参议会第一次会议在汪精卫府召开，出席者除梁外还有张伯苓、胡适、周恩来、李璜等人。这是梁和周恩来的第一次见面。参议会主席蒋介石并没有到会，会议由汪精卫主持。

梁漱溟根据自己对抗战形势的分析提出了自己的持久论的主张，但却没有得到与会者的理解和支持，反而遭到傅斯年的阻止。傅和其他人都认为上海炮火正紧，应当商量军事、外交等问题，而不应该谈什么教育、组织等一些文不对题的话。其实长远地看，梁的主张的确是深谋远虑的。

8月19日，也就是第二天，梁漱溟就奉蒋介石

之命陪军事专家蒋百里到山东视察防务，两个月没有出席参议会。10月初，沈钧儒在参议会提出一项议案，主张利用留日学生回国者和其他失业知识分子组成乡村工作团下乡工作。原案被国防最高会议采纳并决定交由梁漱溟主要负责。梁漱溟认为如果要做，就必须做大些，必须建立全国总动员系统机构，改造现行的地方行政制度，改造教育系统，唯有如此，才可能起到全民动员的效果。梁的意见使得许多参议员和有关的人大吃一惊，觉得这样做牵动太大，都没有勇气去承担此事。幸好这一意见得到了晏阳初、黄炎培、江问渔的支持。于是四人一同去见蒋介石，力陈自己的主张。蒋介石表示乐于接受，当时就指示他们拟定计划，并责成张群从中协助，四人不由十分欣喜。但当梁漱溟起草完成后，国民政府正忙于西迁武汉，蒋介石似乎也忘了当日的痛快承诺，结果只能是不了了之，梁一个月的心血成了一纸空文。

三、孔夫子与马克思的对话

国民党政府的排斥异己、无心抗战的行径使梁漱溟深感失望，并且对抗战的前途渐生悲观之情，而另

一方面，共产党却提出了一系列抗日主张，特别是力主国共合作、共同抗日，这不由深深吸引了梁的心，使他萌生了去看一看的想法。

1937年12月，梁漱溟以国防参议员的身份前往河南、陕西视察防务，但这只是一个借口，他的目的地实际是延安。1938年1月5日，他越过宽阔浑浊的渭河，坐着牛车穿过黄土高原抵达了延安。

梁漱溟首先花了两周时间和党的领导人交换意见，参观政府的各个部门，之后又考察了当时延安军民的生产生活情况。他深深地为当地那种崭新的气象所吸引、所感染。“在极苦的物资环境里，那里的气象确是活泼，精神确是发扬”。最令他感动的是延安军民的乐观主义精神“一般看来，各项人等，生活水平都差不多，没有享受优厚的人，是一种好风气。人人喜欢研究，喜欢学习，不仅学生，或者说人人都像学生，这又是一种好风气。爱唱歌、爱开会，亦是他们的一种风气。天色微明，从被窝中坐起，便口中哼啊抑扬，此唱彼和，仿佛一切劳苦都由此忘却！人与人之间感情增加，精神上互为感召流通”。基于这种好感，他便将自己同行的外甥邹晓青留在延安，参加了革命。

在访问期间，最令梁漱溟难以忘怀的就是与毛泽东的8次会谈。梁和毛20年前同在北大工作过，梁漱溟和毛的岳父杨济昌更是多年好友，故而也算是老

相识。会谈通常在晚饭后开时，有时通宵达旦。毛泽东为梁漱溟斟茶，自己则豪饮烈酒。梁大多情况是正襟危坐，严肃地发表自己的意见，而毛泽东一手夹着土制烟卷，一手用“秃笔粗墨，在大纸上横行写来如飞，并不时流动鲸饮一番”。就这样，孔子和马克思讨论着中国的现在和未来。

毛泽东和梁漱溟代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阶层和生活经历，毛泽东是世代农民，梁则是世宦之家，他们之间的差异更在于二人的信仰——马克思主义和新儒家学说之间。毛泽东谈话时谈笑风生，满口民间谚语，梁漱溟则信守“君子无戏言”，吟诵着古圣先贤的教训。毛泽东穿着随便，天热时会毫不顾忌的光着膀子，即使在正式场合也敢这么做，梁漱溟则无论何时都坚持穿他那学者式的长衫。但这样并不影响他们的谈话。他们各抒己见，谈锋甚健。

梁漱溟强调，中国社会有其特殊结构，与欧洲不同，因此，中国革命是外部引发，而不是内部自发。他认为中国社会是“伦理本位，职业分途”，而反对中国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毛泽东则认为他夸大了中国的特殊性，是温和的改良主义，而解决中国问题，必须用彻底的革命。

两人谈话中虽时常有争辩，但气氛一直比较融洽。梁漱溟事后回忆说：“此番会晤，在我印象甚好。古

时诸葛公称关美髯日逸群绝伦，我今亦有此叹。他不落俗套，没有矫饰，从容自然，而亲切。彼此虽有争辩，而心里没有不舒服之感。大致每次都可以很舒服的回去。”当然，他们两人的谈话最多只能互相启发却不可能达到共识，仍是各人按各自的理想奋斗下去。

四、为国事奔走

梁漱溟的延安之行历时三周，但他不得不带着意犹未尽的遗憾离开延安，因为外界一直认为他在河南开封督促防务。1938年1月25日，他终于又回到了西安，并随即转赴开封，应付差事。2月2日，他到山东曹州与旧日的朋友、同事会晤，但当时的山东大部分已沦陷，先前的朋友大多转移到河南，失去了联系。

2月14日，梁漱溟应李宗仁之邀抵达徐州，在北关农场滞留了一个月，一面继续与流散的朋友联系，一面写成了《告山东乡村工作同人同学书》和《乡村工作人员抗敌工作指南》的小册子四处散发。主要是检讨过去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失误，并试图进一步阐述抗战和乡村工作的关系，对如何处理好两者关系作

了具体的工作指示。

3月3日，梁漱溟结束了山东的工作回到武汉。在延安之时，毛泽东曾经郑重地嘱托他致力于国共合作、统一抗日工作，他也深以为然，准备尽心尽力。但当时恰好国共两党起草共同纲领的事刚陷于停顿，蒋介石对此事耿耿于怀，失去了热心。梁漱溟觉得时机不对，不便于立即重提旧事，只好另谋机会。

当时，梁漱溟的注意力，仍集中在农村问题上。武汉有一个“战时农村问题研究所”，梁漱溟参与其中，经常召开座谈会讨论前后方农村问题。3月29日，国民党在武汉召开全国临时代表大会，梁漱溟借机向大会提出了三个关于农村的建议，但是没有下文。

7月，国民参政会在武汉召开第一次大会。梁漱溟作为参政员出席了大会，除了按他素来主张阐述了自己的建议外，主要是提了三个询问案，并特别强调了关于各党派联合、统一抗日的想法。但像过去一样，建议案的结果是没有结果，询问案的答复是无法答复。

五、改善兵役运动

国民参政会在召开第一次会议后再次西迁到四川

重庆。梁漱溟不愿离开抗日前线，他四处奔走，安排山东乡村工作人员回鲁抗敌。但他却被选为国民参政会驻会委员，只好与同志们告别，随参政会到西南大后方。

无法与同志们并肩作战使得梁漱溟于心难安，更何况与前方消息隔绝，不能及时了解朋友们的状况。于是，梁下决心要选择一项重要的工作为抗战做一番实事。

对于后方而言，重要的工作无非是保证物质供给和提供充足、训练有素的兵源。而当时办得最糟糕的，恰恰是兵役问题。对于国家而言得不到好兵源，另一方面农村也因征兵而苦不堪言。这对于素来重视农村问题的梁漱溟而言，自然是痛心疾首，无法坐视。于是他最终决定选择改善兵役作为自己在后方头等大事。

从此，梁漱溟开始着手于改善兵役的研究。他一方面到乡村调查，收集事实；另一方面又向政府有关部门了解有关法令和现行的规章制度。在研究过程中，他又遇到了许多所见略同的朋友，于是他们便共同研究并向社会大声呼吁，寻求支持，一度使改善兵役运动成为社会舆论的焦点。

1938年6月，四川省政府召开会议讨论兵役问题，并请梁漱溟与会指导。梁漱溟当时刚开始研究，于是仅仅就征兵困难的原因作了解释，说明了征兵若

想成功必须具备的条件。

之后，梁漱溟邀请王寅生、吕超、孔庚等人共同拟定了具体计划，并召开座谈会，征集四川省动员机构、兵役监督系统、出征军人家属联合会等多方面意见，对具体计划进行修改完善。

计划已经完成，下一步就需要政府了解采用，梁漱溟明白，这必须由地方上有声望有资历的人出头才行。于是，他找到四川省府主席王缙绪帮忙，并说动省前主席、声望极高的教育家张澜出面一起去见军委会重庆行营主任张群商量。张群实际负责兵役之事，正为此事而发愁，听了梁的意见后极为高兴，表示完全同意梁的计划，并马上就人力、费用方面着手准备。只等10月10日四川省府全体宣誓就职后，即按预定计划改革省动员系统。

在各方面的积极努力下，改善兵役初期进展顺利，在四川乃至全国产生相当的影响，并于1939年10月正式成立兵役实施协进会。正当梁漱溟等人以为可以松口气时，事情发生了转变。首先是参与此事的四川籍人士态度消极，似乎触动了他们的利益，各方面无法协调配合。梁漱溟作为一个外省人无计可施，只好自动退下阵来，离开了成都。

此时，恰逢国民参议院第二次会议召开，梁漱溟仍就兵役问题提出一个建议案，经大会通过后咨送国

防最高会议，国防最高会议照案交由行政院军委会办理，但最终仍是没有结果。又过了3个月，参政会第三次会议召开，梁漱溟虽几经挫折但仍不死心，再次提出建设案，然而遗憾的是，有人向最高当局进谗言，一度轰轰烈烈的改善兵役运动不了了之，兵役实施协进会也于1940年被蒋介石亲自下令解散。梁漱溟的改良主义行动再一次破灭。

第七章 致力于民主

一、深入敌后

接连的挫折使得梁漱溟对国民政府深感失望，虽然在国民参政会第二次会议上仍当选驻会委员，但他认为继续留在后方已没有什么意义，于是请求到敌后各战地去考察。

早在战前，梁漱溟就曾预料中日双方开战后，将会出现许多敌我双方的军事空白地带，而这些地方由于环境的压力，农民和知识分子将达成共识、通力合作，因此乡治工作将比较容易开展。同时，梁漱溟曾经在河南、山东等省工作过10年，先后培养了近千名中下层工作者，大多数人都留在敌后，音讯皆无。所有这些，都促使梁决心到华东华北的敌后去看看。

1939年2月1日，梁漱溟获得蒋介石的批准，与秘书黄艮庸、参谋王靖波、医生王福溢离开重庆前往华北华东各地视察。

10日，梁一行抵达西安，住在花园饭店。梁漱溟首先拜会了行营主任程潜。之后，他委托八路军西安办事处代为电告前方将领，协助梁的视察。由于通

信困难，仍没有解决进入山东的路线问题。梁漱溟便于20日抵达秋林镇，2天后，他前往拜见阎锡山了解山西战况。返回西安后，于3月3日乘车到洛阳，在第一军区司令员卫立煌的亲自安排下，与新上任的苏鲁游击总司令于学忠一同前往战地，深入敌后视察战况。后在新四军彭雪枫司令员的帮助下，冒着生命危险，昼伏夜行，终于在4月25日进入山东境内。

山东是梁漱溟的第二故乡，那里有他许多的老朋友和学生。他们对于梁漱溟居然冒着生命危险安全到达既惊讶又十分高兴，不断安排演讲和座谈。梁也十分乐意同这些忠实的听众畅谈自己的主张。他还慰问了由他的学生为主组建的第三政治大队。有一次，他随着第三政治大队行军，不想途中与日寇相遇并交火，第三政治大队伤亡惨重，梁漱溟隐藏在东里店附近的一个山洞里，躲过了日军的搜捕，捡回了一条性命。

在这次战地考察中，他历经千辛万苦，甚至经过了生死的洗礼，到过国民党的战区，也到过八路军的战区，历时八个多月，终于由9月17日平安返回重庆。

对于他个人而言，此行真正的收获似乎在于他又重新回到了人民中间，真正体验了老百姓在战时的生活，真实感受了中日交战的实况。通过此行，梁漱溟切实感受到了老百姓的深重苦难和忍辱负重的精神。

夹在敌我的狭缝中，既受到日寇的摧残与压迫，又要资助我方抗日，其苦痛是不亲眼所见所难以想象的，但他们却忍受住了，默默地为抗日奉献了他们所能奉献的一切。

这种蕴藏于人民中的伟大的力量使梁漱溟看到了抗战胜利的希望，但同时，我方存在的问题也是十分严重，这就意味着，到胜利，我们还有一段很长、很坚苦的路要走。

二、党派之争与统一建国同志会

在梁漱溟看来，抗战最大的问题不在于军事而在于政治。中国若要取得抗日的胜利，必须结束目前这种各自为政、一盘散沙的局面，即必须结成抗日统一战线，而联合最大的困难就在于党派之争。

对于党派问题，梁漱溟有自己独特的认识。基于他对中国社会的分析和传统文化的看法，中国向来只有职业的分途而并没有形成真正意义的阶级，因而并不存在政党存在的条件。中国政党的存在仅仅是因为外部条件的引发。因此，中国的政党之间并没有根本的利益冲突，根本不需要刻意模仿外国的政党制度。

无论是多党制，还是一党制都不适合中国国情。照此推理下去，梁漱溟得出的结论是中国政党应该联合，这种制度既非一党制，又非多党制，而是一中有多，多中有一。具体做法是选择个别政党作为第一重组织，所有党派联合结成第二重组织，其中第一重组织做为党上之党。梁称之为“二重组织”说。

但梁的主张却得不到各党派的支持。中国共产党虽然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最早倡导者，但却坚持独立自主原则，强调既有团结又有斗争，自然无法接受大国民党主义。而国民党也对梁的设计不满意，不愿在党派联合体中看到独立的异己存在。因此，当梁将自己的主张写成《抗战建国中的党派问题》寄往《大公报》发表时，却被新闻检查机构扣压。梁经过一番争取仍无法见报，只好将手稿分送给各党派领导人看。

梁漱溟并不因此气馁，他十分想就党派问题与各方领导人交换意见。但蒋介石行踪不定，往往是梁在成都时蒋在重庆，当梁赶到重庆时蒋又飞往桂林。梁无奈之下便转向共产党方面。

10月26日，梁漱溟前往曾家岩56号，与中国共产党的参政员陈绍禹、秦邦宪、林伯渠、董必武会晤。对于梁的主张，陈秦等人表示原则上赞同，但另一方面又重申了自己的一贯原则，表明中共决不单方面放下武器听凭国民党的摆布。

梁漱溟对于两方面的答复都不满意，却自知无法劝动他们。于是，他就萌发了联合国共两党之外的民主人士成立一个中间团体的想法，想借以斡旋于国共之间，为统一进程努力。

当时，梁平日所熟识的第三派代表人物如黄炎培、晏阳初、李璜都在成都。梁漱溟说明了自己的第三派联合起来的主张后，他们都十分支持。于是，梁、黄等人便又多邀了一些朋友商议，决定将这一组织定名为“统一建国同志会”，并起草了同志会的简章和信约。

11月下旬，梁漱溟与左舜生、李璜、罗隆基、罗文干、沈钧儒、黄炎培、张澜等人集会，讨论通过了简章和信约，初步建立了组织系统。为了避免国民党方面的阻挠，他们将信约托张群转呈最高当局，并推举梁漱溟和黄炎培面见蒋介石，陈说一切。

11月29日，黄炎培因有事，只有梁漱溟一人去见蒋介石，梁解释说建国同志会是为解决党派之争而成立的第三者组织，只在国共两党外说一些对政府有利的公道话。在审查了同志会的简章和信约后，蒋并没有表示反对意见，于是，建国同志会就较顺利地成立了。

但现实又给梁漱溟上了生动而又痛苦的一课，像统一建国同志会这样一个结构松散，缺乏内在约束力

的联盟，是不可能团结一致，起到梁预期的目的的。

1940年4月，国民参政会开会时，梁漱溟起草了《请厘定党派关系，求得进一步团结，绝对避免内战、以维国本案》的提案，但许多人怕惹麻烦，不敢署名。最后只有梁的几个老朋友帮忙，提案才得以通过。

经过这次参政会的考验，梁漱溟看清了同志会的现实，因此不再热心，同志会也逐渐解体，加上5月大轰炸，同志会的人士纷纷逃离重庆，失去了联系，也只有不了了之了。

三、劳而无功

1941年1月，皖南事变爆发，本来就很不牢固的国共合作在国民党的一意孤行下更加岌岌可危。为显示诚意，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善后办法十二条，作为恢复合作的条件。中共方面的国民参政员也以书面形式通知国民参政会，在未经政府裁夺前，他们将不出席3月1日召开的参政会会议。

所谓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国共之间由于固有的原则的分歧使得他们间的合作只能是暂时的，而此时已到了分开的时候。现在双方所做的，只是摆出高姿

态，而不愿背上破坏统一的骂名。但显然，梁漱溟是不深谙此道的，他只是天真地从良好的愿望出发，希望调和双方的矛盾，早日取得抗战胜利。于是，他再次斡旋于国共之间，做起了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的调停。

2月22日，梁漱溟、张君勱、左舜生、李璜、沈钧儒、邹韬奋、黄炎培等15人集会商谈，期望以第三者的立场劝说国共双方，重建统一。并推举梁漱溟、左舜生、罗隆基3人负责起草意见，做为双方和谈的基础。梁等3人交换意见后，由梁漱溟执笔起草了4条意见并交由会议讨论通过。于是大家联合签名，准备呈于国共双方。

在中国共产党方面，梁与周恩来、董必武面谈，开诚布公地交换了意见。周表示如果国民党接受，中共参政员将出席参政会。于是，27日，他们又找到了蒋介石，蒋也没有反对意见，只是嘱咐他们再与中共代表商量。梁、黄等人再次找到周恩来，请其撤回不出席参政会的声明，周、董表示应请示延安，再作决定。

第二天，黄炎培、沈钧儒再次去见蒋介石，蒋表示，如果中共方面不出席参政会，则是中共破坏了统一大业

，必须负责。蒋的态度对第三者震动很大，他们

退出总统府后顾不得吃饭就前往周处转达了蒋的原话。周恩来仍表示在等候延安的电报。

当日下午6时，黄炎培打电话询问，周恩来说延安尚无回电。第二天清晨，周恩来、董必武匆匆赶来，解释说电台出了故障，收不到延安指示故不便出席。此时，开会时间已经到了。黄、梁赶到浮图关国民大会堂会场向蒋介石解释，蒋表示可以等一天。

不料，第二天延安的电报是来了，但不是指示中共参政员出席会议，而是提出了新的临时解决办法十二条作为出席参政会的条件。当然，新的十二条较过去条件上降低了许多，但国民党也自然不可能答应。于是国民参政会在中共代表缺席的情况下照常举行。

梁漱溟仍没有放弃努力，他又重新提出三条原则，计划成立一个联合委员会，使国共双方坐下来面对面商谈。然而，对于梁的建议，各民主党派都很消极，黄炎培、张君勱等老朋友虽然没有反对，但劝他在努力之前先争取张群的同意，然后再见周恩来。

张群与梁漱溟曾经多次合作，私交很深，但对梁的意见却不置可否，让他去请示最高当局。而周恩来也缺乏诚意，只是不愿扫梁漱溟的兴而和他打马虎。

3月6日，蒋介石代表国民政府对参政会宣布共产党事件，言辞严重，指责中共屡次破坏军令政令，破坏统一抗战。自此，梁漱溟的努力再次以失败告终，

但在劳而无功的努力之后，我们看到的却是他“明知不可而为之”的伟大的人格力量和儒者风范。

四、组建中国民主同盟

劳而无功的调停工作使梁漱溟看到，如果第三方面不能团结一致而仅凭单个人的力量，是无法真正独立于国共两党之外而起到影响政局的作用的。但上次统一建国同志会的失败仍使他铭记于心，使他明白：一个松散的组织由于缺乏必要的联合、压力也无济于事，于是，成立一个组织严明、系统完备的第三方面组织的想法在他的头脑中萌生。

当即，他便与黄炎培、左舜生、张君勱商议，并决定先秘密布置一切，并在国民党控制不到的香港建立言论机关，来一个先斩后奏，待万事俱备后再公开。

经过秘密、紧张地筹备，他们联合李璜、江渔、罗隆基、张澜等人讨论通过了政纲十二条、成立宣言，并推举黄炎培为主席。3月19日下午4点，梁、左、黄、张等13人在重庆上清寺特园召开了第一次成立全体会议，通过了简章、政纲和宣言，并选举黄炎培、左舜生、张君勱、梁漱溟、章伯钧5人为常委，次日，

又召开第一次常委会。至此，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会正式成立。

他们自以为事情做得机密，却不想成立后第二天就被国民党当局察觉。3月21日，蒋介石得知此事，显得十分气愤，当众责问张群近日都干了些什么，连此事都不闻不问，张群立即打电话向张君勱询问此事。张君勱在电话另一边却装糊涂，矢口否认。第二天，张群亲自前往张君勱府，但张君勱避而不见，张群便对

张君勱的弟弟说自己已经知道宣言的全文，还知道有个十二条纲领，并指出了张、梁等人每次聚会的时间和地点，责成张解释一切。梁漱溟与黄炎培、张君勱商量后，觉得时机不成熟，同盟会仍不公开。于是向张群解释说，所谓组织，仍是原来的统一建国同志会，信条也就是同志会信约。经过这番解释，当局才没有再追究。

五、萧墙祸起

来自外部的压力虽然暂时消失，但内部的分歧出现了，而这种内耗往往是人们最不愿看到但却最致命

的。

这次组建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虽较之统一建国同志会组织纪律严明、系统完备，但由于各民主党派之间利益、原则的差别，所以合作的程度有限，在同盟的指导思想、根本原则方面就存在很大分歧，必然会导致祸起萧墙的悲剧。

就拿身为同盟主席的黄炎培来说，他为人老成持重，因而就倾于本位主义和保守，既想成立第三者的同盟发表独立的主张又不敢得罪国民党。本来，在黄炎培的亲自主持下，同盟会已通过了十二条纲领，但临到集会签名时，黄突然通知推迟会期，而改约张、梁等少数人细谈。他提出十二条纲领应先后分别发表，个别重要条款应该暂时保留，以免引起国民党当局的反感和破坏。他的提议当时就引起了一些人的反感，梁漱溟、李璜等率直的人干脆直接指责黄的懦弱怕事，“欲顾全自己包袱，即不必作政治运动；欲作政治运动，即不能顾全包袱。”最后，与会者还是达成了妥协，决定纲领暂时搁置，待时机成熟再发表。

同时，在创办同盟会的机关报《光明报》时，也发生了许多争执与不快。按照原定计划，本来委托宣传部长罗隆基主持办报，但罗却改变主意不愿意办理此事。梁漱溟无奈之下，只好亲自前往香港。由于国民党当局的重重阻挠，梁3月离开重庆，直到5月2

0日才抵达香港。梁在香港等了一段时间，仍不见张君勱、罗隆基等人到来，只好与当时在港的民盟人士协商办报事宜。值得庆幸的是，他还得到了中国共产党驻港负责人廖承志和在港的民主人士何香凝、柳亚子、彭泽民等人的帮助。经过几个月的紧张努力，《光明报》在1941年9月18日正式创刊。

在办报期间，青年党的代表曾琦忽然向梁漱溟推荐陆荣光为副经理。因为编制已满，实在无法安排，梁漱溟便拒绝了。结果有一天曾、陆邀梁漱溟去茶楼谈判，对梁软磨硬施，百般要挟。曾琦竟然声称：你如此坚持，拒不接受，我们便不再是盟友，我们将以敌人对待你。但梁漱溟还是顶住了压力，始终没有任用陆荣光。

像曾琦这样的威胁还可以应付，但另一件事却使梁漱溟简直无法忍受。报纸出版后，经费仍然十分紧张，梁决定亲自前往新加坡一带向华侨募捐。不曾想在路上碰上了国家社会党《国家社会报》社会长徐傅霖。两人也算是同盟会的同志，因此见面十分客气。梁漱溟为路上遇到熟人而十分高兴，于是说明了此行的目的。谁知徐当时面色一变，立即怒目相向，毫不客气地对梁说：国社党是同盟的成员之一，你我同去募捐，你代表的是同盟《光明报》，我代表的是国社党《国家社会报》，那么一切乐助者肯定将捐款只给

你，而不会给我；你去了，我就募不到了。所以，你要去，我就不去，如果我去，你就不能去。如果你一定要去，只有决裂。徐态度十分强硬，任凭梁漱溟怎么劝说也不通。结果梁漱溟念其古稀之年，又不愿引起与国社党的争执，只好相让，自认倒霉。

在香港办报的这段日子，梁漱溟为了同盟会的利益，不计个人得失，委屈求全。却得不到他人、尤其是自己往日朋友和同志的理解支持，不由感到十分寒心。但值得庆幸的是，同盟终于成立而《光明刊》也终于创刊，这对于他或许就足够了。

第八章 退隐桂林

一、劫后余生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从此太平洋战争全面爆发。8日清晨，日军由九龙进攻香港，同时对香港岛进行炮击和飞机轰炸。久离战争的香港自此陷入炮火、惶恐和混乱之中。

尽管全港一片混乱不堪，但梁漱溟仍保持了冷静与镇定。他一面坚持到报社办公，一面又和萨空了等人为下一步做充分的准备。他们从银行提出了大部分存款，购买了足够全报社员工维持10天生存的大米和维持报纸正常出版相当长一段时间的纸张等材料。但13日，负责承印《光明报》的民生印务公司在炮火的袭击下停工，《光明报》也被迫停刊。梁只好解散工作人员，嘱托他们藏匿身形，最好隐居起来，以免发生不测，但自己却不以为意，仍住在原处。萨空了和俞颂华觉得梁漱溟长期宣传抗日，又是知名人士，一旦香港沦陷，日军必欲得之而后快。于是纷纷劝说，并在12月12日将梁转移到黄瓚族人的一所空房中，准确地址只有少数几位可信赖的人知道。此后的几天，

梁漱溟仍然希望报纸复刊，于是联系其他被迫的报刊组织联合出版。但形势却无可挽回地恶化，他的努力无法实现。

12月25日，香港防军被击溃，港督下令停战，日军全面占领了香港，战争如预料一样以香港的失败告终。日军在香港四处为恶，而盗匪也趁机作乱，社会秩序无法维持。梁漱溟在黄瓚处也无法再呆，便和萨空了、张云川、黄瓚等人于26日躲进香港西环知用中学小学部的一间教室里，随时准备离开香港。

这段期间，梁漱溟等人只能尽量深居简出，白天读书，夜晚聊天。有一天，梁漱溟为联系离港之事外出，走到中环路距香港大学不远处时，恰好遇见了陆荣光。外敌当前的局面消除了两人之前的隔膜，于是边走边谈。突然，在两楼之间冲出一个蒙面人，用刀指着梁漱溟，逼他交出身上的财物。当梁从衣袋中取钱包时，陆荣光见那人两眼直盯着梁，便趁机逃离，向上坡方向飞跑。而幸运的正有一辆警车迎面驶来，陆边跑边大喊“强盗”，警车拉响了警铃。蒙面人见势不妙，顾不得抢梁手中的钱包就仓皇逃窜。虽然是一场虚惊，梁漱溟也吓出了一身冷汗，从而更加坚定了尽快离开的决心。

在萨空了的帮助下，梁漱溟找到了中共在港负责人之一的范长江，说明自己想离开。范长江正好也要

返回内地，并且已联系了一艘小船，便答应带梁一同离开。

1942年1月10日，梁漱溟登上了预先联系的小船，离开了曾战斗过半年多的香港。同行的还有陈此生、陆荣光和范长江夫妇。梁漱溟穿的是中式夹袄夹裤，仍是传统知识分子的装饰，而其他人都已打扮成工人或小商贩的模样，提着小件行李，难免有逃难者凄凉、惊恐的感觉。

小船的船主曾向日军行过贿，可以避免检查。小船宽一丈，长约三丈二尺，三挂帆，没有桨，全凭风力行进。所以一旦顺风，全船人都面露喜色，一旦没有风或逆风，就十分沉闷。那一天，天公并不做美，船走得很慢，再加上船体小，稍有风浪就颠簸不定，所以许多人都晕了船，只有梁漱溟没有什么感觉，大家都颇为惊奇。一路上，不时有日军飞机盘旋而进，或者汽艇擦肩而过，船上的水手和客人都十分害怕，纷纷将珍贵财物掩藏。但有惊无险，众人于当晚10点在澳门登陆。

澳门虽属于葡萄牙管辖，但此时却已经被日军占领，所有的轮船被扣住不许开。梁漱溟一行先住在旅馆，后因为旅馆耳目太多，并不安全，便在澳门朋友冯祝万等人的帮助下，移居到一间空房子里，伺机由澳门到内地。

当时澳门的状况也相当糟。想由澳门到内地的人很多，粮食供应不足，米、盐、油等生活必需品由政府公卖，必须凭澳门居民证购买。梁漱溟等人饮食起居十分不便，因此急于离开。只是可供选择的途径却很少。首先是轮船不开，如果想循正常途径由石岐向内地走，不仅要经过日军几道检查，而且要先在澳门向日军管理机关缴照片，领取通行证、良民证，手续繁琐，而梁身份特殊，这条路也走不通。

剩下唯一的可能就是乘小船偷渡、漂流过海。但海上多海盗，太不安全。于是，梁等人经朋友介绍，找到了当地的海上一霸吴发，吴发对梁早有耳闻，并颇为钦佩他的为人，于是答应帮助他们离开。

1月17日下午，吴发派人接引梁一行人乘坐他们向内地运棉纱的货船。天黑之后，船便乘夜色分别载着梁等人向内地行驶。

梁漱溟乘坐的那只船刚开走不久，忽见陆荣光乘坐的船赶来，说梁不会粤语，如途中有事怕难以应付，特地派精通粤语的陈此生与梁同行。梁便和陆换了船，与陈此生同船扬帆前进。

此夜天公作美，风向一直很顺，小船在静静夜里飞速前行。梁漱溟躺在棉纱上，仰望满天闪烁的星光，腥咸、湿润的海风吹拂，

身边是宁静的夜色和平静的海，不由得思绪万千。

想着这一路虽然间有虚惊，但总能逢凶化吉，应该算是顺利了，“今后的中国大局以至建国工作，亦正需要我；我不能死。我若死，天地为之变色、历史将为之改辙，那是不可想象的，乃不会有的事！”想到这一点，他更加自信自己会一路平安，因为将会有许多重大的使命等着他去完成，而且非他莫属。但正当他想到此时，风云突变，海面起了风浪，小船颠荡欲覆，浪花直泼到船内。不得已，小船停到一个荒凉的小岛上，直到第二天黄昏才又继续前进，不多久便到达了目的地——都斛镇海口东（濬）口，在那里与范长江会合。

没想到靠岸时，他们又遇到了麻烦。当地的警察要求他们上岸问话，但现在正是后半夜，而且从船离岸还有几十丈必须涉水而过，梁漱溟特别是范长江的夫人确实不便上岸。于是梁托范长江、陈此生持他的名片上岸向警察解释。警察长一见梁漱溟的名片又听到范、陈的说明，态度立即转变。原来都斛警察所朱所长是梁学生的兄长，对梁、范等人也久闻大名。因此，天亮之后就接梁漱溟一行上岸，并喊来轿子送他们到镇上去。

梁漱溟曾于1927年到1929年在广东工作、讲学，附近学生和旧友非常多。所以在都斛就受到了朱元凯、朱灵均等众多学生的欢迎和款待。20日前

往台山县时，受到县长陈山章的迎接，当地的各级长官和新闻记者都前来看望梁，并祝贺他是文化界从香港脱险到内地的第一人。

事后，梁漱溟才得知同行的陆荣光却在途中被海盗掳去，但最终被放回。不由得感叹造化弄人，若不是两人恰好换了船，被掳去的很可能就是他了。

二、再度归隐

从上次退隐京师后复出，至今已有15年了。15年中，梁漱溟有过事业的挫折、思想的苦闷和朋友的背叛，特别是对国民党完全失望、对共产党又不信任使他难以看清中国的出路。种种失意的痛苦使得他对于现实已经厌倦了，想再次隐居，从而忘却烦恼、平静心情，好好思索一番。

于是，21日晚，梁漱溟向国民参政会发了一份电话，说明自己已安全离港，并嘱托他们公开此消息以告知各方。之后，他便由台山出发，于2月5日抵达桂林，重温已阔别15年的隐居生活。

桂林风景秀丽宜人，更是梁漱溟祖籍所在。他早有回故乡寻根的念头，只是“久在樊篱中，一去十五

年”苦于找不到机会而已。此次来桂林，他已抱定了隐居的决心，结果在三年内果然不入社会、少谈政事，除了与朋友聊天、下棋之外，就闭门苦思，俨然有前晋隐士之风范。

然而，他虽然不问政事，社会却不能忽略他的存在。梁漱溟既是著名学者，又是知名的社会活动家，在第三派人士中影响力很大。无论他投向国共哪一方，都将是一股较大的政治力量。因此，从他隐居开始，国共双方都极力邀他出山。

1942年，张云川来到桂林，并带着周恩来的一封信，劝说梁漱溟去苏北或任何中共辖区，中国共产党将全力支持他从事乡村建设活动，同时，这也是同盟会朋友的意见。但梁漱溟不加考虑就婉辞拒绝了，他虽然与国民党有些矛盾，但还不想彻底决裂，他也不愿意从此倒向共产党，为了保持他将来的影响，他希望始终站在第三者的中立立场上。

1943年秋，国民党成立“宪政实施协进会”，请各方面人士参加，并力邀梁漱溟参与其中，梁仍然是一口回绝。

在梁漱溟隐居期间，各方面的邀请总是不中断，但他始终坚持中立立场，当场拒绝，绝不留一丝余地，过着与世无争的隐居生活。

三、再婚

当然，三年的隐居生活并不是平淡无奇的，至少对于梁漱溟个人而言就发生了一件大事，那就是他的再婚。

梁漱溟元配黄靖贤已经于1934年夏天病逝于邹平，并给梁留下了两个孩子。黄是旧式妇女，缺乏才学，而梁漱溟本来就不热心于婚姻，再加上繁忙的工作和孤傲的性格，因此夫妻间完全像旧式家庭一样，相敬如宾但缺乏必要的了解与沟通。故而，梁对于黄的去世并不感到悲伤，反而认为是一种解脱。所以他写了一首很奇特的悼亡诗：

我和她结婚十多年，
我不认识她，
她不认识我。
正因为我不认识她，
她不认识我，
使我可以多一些时间思索，
多一些时间工作，
现在她死了，

死了也好，
处在这样的国家，这样的社会，
她死了可以使我更多一些时间思索，
更多一些时间工作。

其实，不必责怪梁漱溟的无情，这场旧式的婚姻从开始就注定是失败的。或许也不能称之为失败，因为既然是旧式的婚姻，双方都没有感情的投入和追求。婚姻在于梁漱溟，本就是一种责任和道德的追求。更何况当时的他，正踌躇满志，欲以天下为己任呢！

也正因为如此，10年来，有人也曾多次为他做媒，他都一口回绝，并当众发誓不再结婚。或许是历尽沧桑后的难得的安定生活使他迫切想要一个完整的家，或许是他根本就坠

入了爱河，在他结识了陈树芬并相处了6个月之后，他转变了念头，决定结婚。

这段爱情与婚姻一度在国内传为美谈，在桂林城更是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一时间，记者们往来穿梭于梁漱溟与陈树芬之间，套取二人之间的传奇韵事。报刊杂志也常拿这位文化界名人做文章。梁的老朋友们也拿他开玩笑，戏称梁漱溟爱情的胜利“为我们这些中年伙伴赢得了荣耀”。更令人惊奇的是，梁漱溟这位平时不苟言笑的“圣人”不但对此不以为忤，反

而是跟着添趣。一次桂林满城风传梁漱溟在蓄胡子，以便在爱人面前显得更成熟，更像个男子汉。梁站出来辟谣，说：“一个老新郎在婚礼之前总是要刮刮胡子的。”

44年1月23日下午，梁与陈按传统的方式举行了婚礼。梁的老朋友及各届人士纷纷到贺。婚礼异常热闹，梁漱溟也显得很高兴，神态、举止就像少年人一样。在婚礼上，梁还亲自唱了京剧《连环套》选段，扮演的竟然是楞头小伙子黄天霸。更有甚者，在演完之后，他说了句“我去也”，之后，就挽着新娘兴冲冲地走了，留下满座开怀大笑的宾客。

但值得一提的是，当梁漱溟已是垂暮老人之时，谈及自己的婚姻，他怀念的却是第一次，他觉得第二个妻子个性太强，夫妻间常发生争执，互不相让，使他很不快。

但不管怎么说，在当时看，梁漱溟还是显得十分幸福。陈树芬不但照顾了他晚年的生活，甚至改变了他的性格，使他变得开朗了许多，与先前的梁漱溟简直判若两人。

第九章 内战与和平

一、重返政坛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宣布日军无条件投降，至此，中国人民在经过8年多浴血奋战后终于取得了抗战的胜利。在举国欢庆胜利之时，有识之士却不那么乐观，外患虽解，内忧未平，能否停止内战、和平建设新中国，关键就看国共双方的态度了。

就国民党而言，无论是政治、军事力量都较之共产党有绝对的优势，更加上有美国明里暗里的支持，“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自然不愿意有一个强大的共产党存在而分享胜利的果实。但国民党又苦于有消灭共产党之心而缺乏充分的准备，只好一面邀请毛泽东谈判，做出渴望和平的姿态；一方面调运士兵和装备，为内战做积极的准备。美国为在远东培植力量而主动扶持国民党，他们一方面指定国民党军队为接受日军投降的唯一代表；一方面帮助国民党军队的调动并提供大量先进的军事装备。

对于国民党的真实态度，共产党十分清楚。因此

以革命的两手对待反革命的两手：既主动恢复和谈，为和平建国努力；又积极的做思想和军事的动员，随时准备战斗。

双方虽然心照不宣，但对外却要作出高姿态，谁也不敢背上首先挑起内战、破坏和平的恶名。于是，8月28日，毛泽东在周恩来、王若飞的陪同下，由延安飞抵重庆，开始与国民党代表进行和谈。经过一个多月唇枪舌剑的较量，双方终于在10月10日签署了著名的双十协定，决定在和平建国方针的基础上避免内战，建立民主的、宪政的新中国。

久居僻壤的梁漱溟自然无法看清真相，而被字面上的协议所迷惑。他天真地以为战争已经彻底结束，现在考虑的是和平建国的方法问题。因此他决定复出，但不是进入政坛，而是要离政治远一些，从事文化的研究，从而对建设文明、民主的新中国做贡献。

于是，他又毅然离开刚精心构筑的爱巢，投身于社会之中。他在老朋友李济深的帮助下，来到了广州，准备着手于文化研究。然而，敏感的他很快明白形势之微妙，国共双方即使在谈判的同时仍是冲突不断，仅大的战役就有上党、绥远、邯郸三次。目前的中国就像一个火药桶，只要有导火索，内战一触即发。

梁漱溟再也无法静下心来研究文化了，知识分子的良知与责任使他改变了想法，再次投入到政治之中，

为和平奔走呼吁。

二、召开政治协商会议

经过对形势冷静的分析后，梁漱溟认为和谈工作应分两步实施：首先应该促使国共双方回到谈判桌旁，实现全面停战；其次应该组织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各方面共同协商国事，从而建立民主的新中国。

基于以上分析，梁漱溟于1945年11月由广州匆匆赶到重庆，与各届人士特别是过去在第三派的朋友商议后，便积极投入到和平与民主两项工作中。

当时国共双方的争执集中在东北问题上。东北地区土地辽阔、物产丰富。并且日军曾在此苦心经营几十年，交通便利、工业发达，因而战略地位极其重要。国民党在美国的帮助下，空运部队准备接管东北。而共产党却先行一步，早已派罗荣桓、黄克诚率13万大军开赴东北，而且当时的中共中央委员就有四分之一以上进入了东北，其中包括陈云、高岗、张闻天等重要人物。因此东北局势日趋紧张，内战随时可能爆发。

梁漱溟深感东北问题的严重，于是与第三方面人

士一起斡旋于国共两党之间，呼吁和平，并声明谁若是发动内战，就将成为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在各方面的积极努力下，国共双方于1945年10月20日起恢复和谈，商议解决受降、解放区政权、军队整编和召开政协等问题。到1946年1月10日，双方终于达成并签署了停战协议，从而暂时解决了和平问题。

在当天，政治协商会议也在重庆开幕。参加会议的有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同盟、青年党和无党派人士。梁漱溟作为民盟代表出席了会议。

政协会议下设宪章、国民大会、政府组织施政纲领和军事5个小组，按民主的原则共同商讨军队、政权等问题。梁漱溟最初被分在宪章小组，但他一心关注整军问题，因此在他的一再坚持下改分到了军事小组。

由于遵循民主原则，国民党在政协中不占绝对多数。而各民主党派却因政见相近自觉倾向于共产党一边。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作为国民党主要代表孙科一心想做行政院长。因此在协商中对中共和民主人士的意见总是点头承认，待生米做成熟饭后才向蒋介石汇报，蒋介石吃了哑巴亏却又无可奈何。

这此政协会议通过了五项决议，如规定实行军党分治、军政分治等，实际上否定了国民党的一党专制

和内战政策。这正是梁漱溟多年来的理想与追求。

三、去意彷徨

停战协议的签署和政协会议的成功，使梁漱溟看到了和平、民主的曙光。他又天真地以为战争问题已经解决，剩下的只是建立新中国的问题。于是他又萌生了退出现实政治，致力于文化研究的想法。

1月26日，政协会议已取得了协议，只等各方代表签字生效。周恩来来到民盟总部看望梁漱溟等人，一方面庆祝胜利；另一方面表示如协议生效就马上要改组政府，希望大家参与其中，共同努力。当时梁漱溟、张君勱、张东荪三人不约而同地表示不愿参与政府。周以为是自诩清高的知识分子故作姿态而已，所以笑了笑不置可否。但梁却是认真的，他托周给毛泽东带去一封信，表明自己的努力至此终于可告一段落，今后要致力于文化研究，要远离政治，处于中立的位置反而便于说话，并请毛泽东予以谅解。

毛泽东自然无法谅解。他在复信中言辞恳切，希望梁留下，而周恩来则话语严厉，不允许梁离开。但梁漱溟却不为所动。这和他一贯坚持的立场有关。

因为他深知，只要涉足政坛，就必须投向国共中的一方，夹在中间摇摆不定就会被挤死。而他却无法看清国共中哪一方更先进，只有先离开，和国共两党保持等距离，这样反而能赢得主动，成为国共两党都不敢轻视的第三派政治力量，他的话才更具力量。

正是基于这样的想法，梁漱溟完成发表了《八年努力宣告结束》和《今后我致力之所在》两篇文章，公开表明自己的立场和退出政治的想法。之后，他又与叶石荪、李源澄商量，准备在昆明建立一个文化研究所，开始文化研究工作。

激流勇退、明哲保身，这正是梁漱溟在政治上的精明之处。国共双方虽然都明白，却也拿他没办法。但梁漱溟却忽略了一点，他所代表的第三派手无寸铁，而国共两党都挟兵自重。如果在和平建设时期，第三派或许能起到制约的作用，但处于战争年代，双方尤其是在军事、政治上都占绝对优势的国民党是不会顾忌那些不起实质作用的批评的。

1946年1月31日，政协召开综合小组会议，对各项问题做出了最后的一致意见。一个小时后，国民党中央就召开了长达3个小时的会议。谷正纲、张道藩等右翼在会上哭诉政协决议使国民党什么都没有了，一切都完蛋了。但蒋介石却不动声色，只淡淡地说，这仅仅是个草案，还有国民大会呢。很显然，在

蒋介石心中，政协决议不过是一纸空文而已。

国民党对政协决议的仇视日益明显。2月4日，梁漱溟报告政协工作情况时，不断有特务从后面扔石头打人，使会议无法进行。2月10日，在政协成功庆祝大会上，特务们更是寻机闹事，郭沫若、李公朴等著名人士都挨了打，梁漱溟刚上主席台也被石块逼了下来。到了3月，国民党更是死搅蛮缠，逼着各届人士修改宪章草案。

共产党此时显示了大度。3月15日，周恩来表示可以做出让步。当时，梁漱溟正二访延安，参观解放区的军民共建情况。听了周恩来回来之后的报告后，他明白和平又出现了危机，他的学术研究计划又一次落空了。

3月25日，梁漱溟搭乘周恩来的飞机赶回重庆。在刚宣布退出政治之后，他又再次为政治问题的解决而奔走。

四、谈判桌前的努力

鉴于国民党的真实态度，同时也为在谈判中取得有利地位，中国共产党利用苏军正式撤出长春而国民

党军队尚未到达的间隙，于4月18日向国民党收编的伪军姜鹏飞部发起进攻，当日即占领长春。随后，又一鼓作气拿下了哈尔滨和齐齐哈尔。很显然，中国共产党已决心不再顾忌苏美格局的限制，而依照中国的实际情况和自己的革命主张，走自己的路了。

美蒋方面显然对共产党的这一行动估计不足，所以愤怒之余还十分惊奇。蒋介石对此尤感气愤，他一面调集兵力，部署在长春四周准备力夺；一面扬言共军必须退出长春，如不自行退出，我必拿下长春，强调长春问题是和谈的唯一关键的问题。

美国方面则冷静得多，马歇尔看出了共产党的战略意图：如果国民党借长春问题扩大内战，苏联必会以护路为借口继续在东北驻扎军队。而国民党军队全力向北推进，则必然造成阵线太长、兵力分散的局势，很容易被逐个击破。那样一来，整个东北局势将对中共有利。但马却又不能放弃长春，那也会不利于国民党控制东北。为此，老奸巨滑的马歇尔设计了一个“两全其美”的方案：以长春为谈判桌上讨价还价的筹码逼共产党让步。首先逼共军撤出长春做为停止内战的条件，但国民党军队暂时不进入长春，而是进一步要价，使中共作出更多的让步，然后再一举拿下整个东北。

4月18日，马歇尔从美国赶到重庆，当日就与

周恩来见面，二人商谈并没有结果。马于是在4月22日找到了民盟，希望由民盟出面调停，并将自己方案的第一步透露给民盟的负责人。梁漱溟、黄炎培、张澜等文化人自然无法看清马的阴谋，便欣然同意。于是，民盟便作为第三方面的主要代表斡旋于国共两党之间，为和谈牵线搭桥。

梁漱溟在民盟中虽然是五位常委之一，但在他的再三坚持下并未担任任何实际职务。然而，自张东荪辞去秘书长后，该要职已经空缺达两个月之久，使民盟的实际工作没有人管。在大家的再三劝说下，梁终于答应出任民盟秘书长一职，但言明只干三个月，他那时天真地认为“三个月或者大局可以归于和平”。

5月初，梁漱溟正式任职。当时，国民政府还都，由重庆又搬回了南京，民盟总部也随之于5月8日迁到南京蓝家庄。民盟主席张澜年事已高，不愿离开四川老家，所以民盟的实际负责人就成了梁漱溟。梁也无可推卸地撑起第三派的大旗，以全部精力投入调解工作中。

为解决长春问题，梁漱溟等人草拟了一个调停方案：请中共军队撤出长春而国民党军队也不进去，由警察维持市内秩序。周恩来看过方案之后表示要先请示延安，但从语气中表示赞同。4月29日晚，民盟又将此方案交给马歇尔看，并请马转交给蒋介石。但

马歇尔拒绝了，同时将蒋介石提出的条件转告给梁等人和周恩来，要求中共单方面妥协，让出长春。声称这是和谈的唯一基础，否则他将退出调停。

周恩来自然无法接受蒋介石的这一条件，并明确指出国共的分歧不仅仅是长春问题，蒋介石想的是先打仗，更有利之后再谈判。而马歇尔坚持认为是共产党占领长春破坏了和谈，战争不可避免，所以他只能退出调停。

马歇尔此时退出调停，自有他的考虑。在4月23日，国民党在美国海军的帮助下，又向东北调运了9个军的兵力，在军事上又恢复了优势，因此他希望借战场上的胜利打破国共在谈判上的僵局，增加谈判的筹码，迫使中共方面让步。

然而，事态的发展并不像马歇尔想象的一样。在东北战场上，国民党并没有讨到实质性的便宜，而且战火开始向关内蔓延，大有进一步扩大而发展成全面内战的趋势。这显然不是蒋介石所愿意看到的，他毕竟还没有做好充足的准备。因此，5月1日，蒋介石在集合军政人员训话及对中央记者谈话时，口气变软，声明只要共产党放弃长春由国民党军队接管，其他问题都好商量。

共产党自然不会被蒋介石的伎俩所迷惑，但为了不给敌人以“我欲内战”的口实，周恩来于5月3日

召开中外记者会，重申必须全面停战，然后才能坐下来谈其他问题。

为打破国共之间的僵局，民盟方面决定把原来向马歇尔提出的方案再次向国共双方公开提出。收到梁漱溟发到的电报后，毛泽东于19日电告周恩来表示欢迎民盟的主张。但寄往国民党的电报却入泥牛入海，音讯皆无。

3月19日，形势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中共部队在林彪的巧妙指挥下安全向后撤退，放弃了长春城，并且给国民党军队造成了溃不成军、损失惨重的假象，而国民党的前方将领为了邀功，故意夸大胜利。这无疑迷惑了蒋介石。20日，蒋介石听到前方报捷后十分兴奋。23日带着宋美龄、白崇禧飞往沈阳。当天，国民党军队开入了长春。

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的蒋介石一面指挥军队继续向前开进，追击共军，企图扩大战果；另一方面在谈判桌上漫天要价，进一步提出了接收全东北和美方决定权问题。全然不顾自己先前许下的诺言。

对于蒋介石的背信弃义和节外生枝，共产党自然难以接受，但为了和平，又做出了最大限度的让步，并致信马歇尔，希望由他出面调停。

对于蒋介石的所做所为，马歇尔也很不满意。因为蒋的做法已经偏离了马歇尔早先设计的轨道，而且

与他的“先南后北”、“稳定关内”的战略方针相违背。马歇尔并不愿意在东北问题上投入太多精力，而是想先稳住东北局势，等关内尤其是南方问题解决后再考虑东北问题。因此，在收到中共的来信后，他立即转交给蒋介石，希望中共方面的让步能换来和平，但蒋介石却不予采纳。无奈之下，马歇尔开始向蒋介石施加压力，在征得杜鲁门总统的同意后，他于5月26日和31日两次致函蒋介石，要求蒋命令部队停战。

马歇尔同时向国民党高级军官分析局势和自己的战略方针。他强调中共军队并没有在撤离长春时遭到实质性打击。相反，国民党军队因为战线拉得过长而处于明显劣势，如果继续向前进攻，就很可能被共军集中优势兵力逐个击破而失去已取得的胜利。那时再和谈，就处于被动地位了。马的分析的确是十分正确的，因此引起了国民党高级官员的重视。宋子文、王世杰等人立即将马的意见报告给蒋介石。但蒋很显然被“胜利在望”的假象冲昏了头脑，已到了一意孤行的地步。因而对马的建议置若罔闻，继续发动对共产党的军事进攻，对于马歇尔，则干脆避而不见。

马歇尔对蒋介石的不明智感到十分恼火。6月5日，他通知蒋介石除非东北停战，否则将不再帮助国民党运输军队和给养。对于马的最后通牒，蒋介石再

也不能无动于衷。他当天就从北平赶回南京，在求马通融没有结果后，不得不在第二天发布东北停战令。

6月8日，梁漱溟、李璜等人受第三方面委托拜访马歇尔。双方就和谈问题交换了意见，并决定中外的第三方面采取一致的方针和言行，督促国共两党停止内战、和平建国。

6月9日，周恩来由延安回到南京，公开声明了共产党“竭力争取和平，哪怕短时间也好”的原则。于是谈判又艰难地开始了。

此轮谈判，国共双方争执的焦点已由长春问题转为美方仲裁权问题。按国民党的想法，美国在执行和解释双方协议中具有决定权。而共产党自然明白美国所持的明显不公正的立场，但为了和平的实现，提出应该对美方仲裁权加以必要的限制，以保证公平。

然而，国民党在这一问题上却丝毫不让步，谈判又陷入了僵局。梁漱溟等人无法说动国民党，只好又去劝说周恩来，称美方仲裁权只是名义上不好听，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希望周出于和平的考虑再作出妥协。在第三方面的苦劝下，周恩来请示了延安，最后表示可以让步，但在名义上不能承认，而是将之分为四点，逐一解决，合起来就在实质上等于美方决定权。

中共在和谈中再次让步却并没有使蒋介石满足，他又重施旧计，在6月29日也就是停战最后期限的

前一天提出了苏北问题。

对于蒋介石的出尔反尔、变本加厉的流氓行径，中共实在忍无可忍，因此坚决反对将苏北交给国民党。眼看停战期满，内战又将爆发，梁漱溟等人焦虑万分。29日晚8点，梁漱溟、莫德惠等人再次找到周恩来，请求中共让步。周恩来激愤地说道：“我是淮安生的孩子，我若同意此要求，我无颜面见淮安父老！”明确表示无法再谈。

梁漱溟等人知道再劝也无用，只得另想办法。他们找到国民党方面代表王世杰，商量着先在协议上签字，实现停战，日后再商讨苏北问题。王世杰觉得可行，但蒋介石显然毫无和谈诚意，断然拒绝了这一建议。

谈判一直延续到7月12日仍没有取得任何结果。蒋介石失去了再等下去的耐心，下令全军开火，自己却上庐山避暑。内战在数个月徒劳无功的调解之后终于全面爆发了。

五、有第三颗子弹吗

中国人民刚结束了八年艰苦卓绝的抗战，迫切需

要一个和平安定的环境休养生息。但蒋介石却倒行逆施，把人民又拖入了内战的深渊，必然要遭到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

1946年6月23日，上海各届人士10余万人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反对国民党政府的倒行逆施，要求恢复和平。情绪激昂的群众公推马叙伦、雷洁琼、阎宝航等人为代表前往南京请愿。当天下午，请愿代表到达南京下关车站，突然遭到了国民党当局精心策划的自称“苏北难民”的大批暴徒的围攻和毒打。马叙伦等多名代表身受重伤，前来欢迎的人士和记者也被毒打和驱散。这就是著名的下关惨案。

下关惨案发生后，善良的民主人士自然无法坐视。6月25日，梁漱溟、黄炎培、章伯均等人联名致信国民党当局，声称：此次下关惨案“情节离奇，遐迩莫不惊异”，“并非全由下关之军警不得力，而突出于一种特务活动，人所共见，不容否认。”因此，他们一方面要求政府严惩凶手，另一方面请国民党“取消特务机关，切保人民之各项自由”。

然而，国民党既然敢发动全面内战，就自信已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因而撕去了民主的外衣，露出凶残的本来面目。这时的国民党已经孤注一掷了，对于敢于反对他的人，就不惜大开杀戒，即使是手无寸铁的民主人士。7月11日，下关惨案血迹未干，民盟中

央委员、激进的左翼人士李公朴又在昆明街头被暗杀。15日，民盟另一位中央委员闻一多又惨遭毒手，暴死于昆明。

惨案接连发生震惊了全国，特别是李公朴、闻一多之死对于民主同盟触动很大，他们不得不向国民党当局再次提出严重抗议，而身为民盟秘书长的梁漱溟更是挺身而出。

李公朴被害的消息当天就传到了南京，当时民盟中央的其他负责人都在上海，梁漱溟便以个人的名义发表声明。他说：“公朴先生被害，无疑是为了当前政治斗争，尽管正凶没有捕到，好像无法证实是国民党特务之所为，但此事无待申说，大家心里都明白是怎么一回事”，“现在政治是这样黑暗，统治者已经超过法律，用特务手段行其统治。”四天后，又传来了闻一多被害的消息，梁漱溟又以民盟秘书长的身份发表书面声明：“李闻两先生都是文人、学者，手无寸铁，除以言论号召外无其他行动。假如这样的人都要斩尽杀绝，请早收起宪政民主的话，不要再说，不要再以此欺骗国人，”“我个人极想退出现实政治，致力文化工作，但是像今天这样，我却无法退了，我不能躲避这颗子弹，我要连喊一百声：取消特务，我倒要看看国民党特务能不能把要求民主的人都杀光，”“白色恐怖无法压弯梁漱溟的铮铮铁骨，反而打消了

退出的想法，激起他斗争的勇气，他已不再顾忌个人的安危，将斗争的矛头直指国民党当局。

17日，梁漱溟又负责起草了民盟中央的声明，控诉国民党政府的暴行，并向全国人民疾呼不要屈服于压力，而应团结起来，为自己的生命安全和言论等最基本权利抗争。言辞可谓激烈、大胆。

然而仅过一天，也就是7月18日，民盟北平市委负责人孙中原被暴徒绑架。这一连串的政治事件使梁漱溟明白，仅仅表明声明抗议是没有用的，必须要拿出确凿的证据，让国民党当局无可辩驳，才能打击国民党的嚣张气焰、赢得国人和国际社会的支持。

7月22日，梁漱溟等民盟主要负责人联名致函国民党政府，公开要求“政府立即选派公正人员，与本盟所推派之人同赴昆明进行调查惨案真相，早日公诸社会。”国民党政府自然不会答应，但却也不能断然拒绝，于是只同意民盟自行派人独立调查，政府给予交通和调查中的便利。民盟最初推选罗隆基负责去昆明调查，但特务却放出风声：罗不能去，否则就将死在昆明。罗隆基便不愿前行，并同许多教授和民主人士躲进了美国领事馆。潘光旦和费孝通更是去了广州，不再过问政治。险恶的环境并没有使梁漱溟退却，在他人都不敢去的时候，他却挺身而出，决定亲往昆明调查。在临行的记者招待会上，他拍案而起：“特

务们！你们有第三颗子弹吗？我就在这里等待着！”他的浩然正气令国人钦佩，也震慑住了国民党特务，由于梁漱溟目标太大，反而保护了他，使他免遭毒害。

8月6日，梁漱溟一行经重庆抵达昆明，开始独立调查李、闻案件真相。国民党虽然没有指派特务暗害梁，却对调查进行百般阻扰。首先，他们派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张寿贤“陪同”梁同往昆明，一路监视梁的言行；之后，蒋介石又特派顾祝同等几名国民党政府要人和大批军警飞往昆明，名义上协助调查，实际上严格控制梁的行动。他们与云南省主席卢汉、警备司令霍揆彰以及昆明警署上下通气，百般阻挠。

在特务的严密监视下，加上几个月来的恐怖氛围，各方面的人都不敢和梁漱溟接触，更不敢公开提供证据。因而，调查开始进展得十分艰难。幸好，梁漱溟得到了美国领事馆和中共昆明地下组织的帮助。美国大使馆曾就李闻案件在昆明调查过，掌握了不少有用的材料。而李、闻二人都是左翼人士，与地下党接触频繁，因此地下党也掌握了一些第一手资料。梁漱溟经过一段紧张、秘密的工作，基本弄清了案件的内幕，收集了大量物证和部分人证，并调查清楚了凶手正是云南省警备司令霍揆彰的手下汤时亮。

调查既有结果，梁漱溟立即电告民盟中央，民盟中央呼吁政府立即召开李闻案的公审大会。而梁在昆

明也无法再继续调查了，便于8月22日飞回上海。

25日，梁漱溟在上海召开记者招待会，公开报告了此次调查的经过和结果，在谴责国民党政府的同时，也提出：李、闻案件系政治性案件，交给一般法院无法判决，应立即移交南京组织特殊法庭审理。但梁也明白这一主张难以实现，因此特别强调：如果政府不采纳我们的意见，我们也用不着强求，因为这只是又一次证明了政府的隐私。

特别法庭自然没有开庭，而“公审大会”在国民党阻挠下也无法进行，况且即使举行了也不会有什么意义。于是，震惊全国的李闻案就这样悄无声息的结束了。但李闻二人的惨死却具有重大的价值，他们用生命和鲜血唤醒了国人，教育了仍对国民党抱有幻想的第三方面人士，使他们认清了国民党的反动的本来面目。尤其是梁漱溟，亲往调查李、闻案使他进一步了解了国民党的黑暗统治，尽管他仍然坚持保持与国共两党“等距离外交”，但毕竟由此而倾向于中共一方。因而，对于梁的政治态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六、一觉醒来，和平已经死了

国民党政府的法西斯统治和李闻案的不了了之，使得梁漱溟对于现实政治极度失望，他看不出自己还能做些什么，又应该做些什么，他又萌生了退出政治的念头。

8月25日，他决定辞去民盟秘书长的职务。他说：“当初我只答应干3个月，现在6个月也有了，事情无可为，所以请践前言，准我辞职。”但当时民盟境况极糟，在国民党的压力下，青年党已退出民盟，投靠了国民党政府，而民社党也要求退出，如果梁一走，民盟只怕立即就要解体。因此，张君勱等老朋友苦劝梁留下主持大局，“假如说有一个人可以称为民盟之父的话，那么这个人就是梁先生，我看梁先生一走，民盟就散了。”梁漱溟自然不忍心看着自己苦心经营的民盟解体，更何况民盟目前已成为第三方面的主要代表，如果连民盟都不存在了，那么第三方面就更没有托避之所和说话的机会了。因此，他辞职之事只得做罢。

梁漱溟虽然感叹自己无所作为，但对于中共方面而言，第三方面却仍是很有用的政治力量。当时，内

战形势对国民党越来越有利，国民党军队已在连续的进攻下夺得了许多解放区，同时在谈判桌上更是漫天要价，提出了许多苛刻的条件，根本无意于和谈。处于不利条件下的中共方面十分希望能取得和谈的成功，至少能停战一段时间，而有时间做军事上的准备。因此十分希望第三方面能出面调停，给国民政府施加压力。

于是，周恩来于8月29日找到了梁漱溟，一方面对梁漱溟亲往调查李、闻案的无畏精神表示钦佩，另一方面向梁漱溟介绍了当前国共交战及和谈的形势。之后，又感叹第三方面竟然听之任之，无所做为。言下之意，是希望梁漱溟能再次出面调停。梁漱溟自然无法拒绝，同时他也感觉民盟一段时间来太过妄自菲薄，于国并没有做什么有益之事，便下定了继续担当调解人的决心。

他立即前往拜会了马歇尔。当时美国政府已逐渐抛开了“调解人”的外衣，开始公开支持国民党打内战。8月间，美国陆军助理次官彼得生和美国对外清偿委员会就决定将抗战期间美国留在中国及附近的军用物质以廉价出售给国民党政府。梁漱溟一方面希望马能说服美国政府停止这些鼓励内战的举动；另一方面想请马歇尔同他一起共同致力于国共间的调解工作，争取和平。对于第一个意见，马表示无能为力，但他

同意调解国共间的争端。于是，马歇尔、司徒雷登会同梁漱溟等人积极向国民党方面进言，施加压力，在他们的一再努力下，蒋介石勉强同意重新恢复国共和谈。

马、梁等人高兴之余，正准备发函请周恩来开会。但他们高兴得太早，蒋介石此时却加紧了攻势，共军节节失利，张家口危急。9月29日，周恩来致急电马歇尔，请转告蒋介石立即停止进攻张家口，否则国共和谈从此全面破裂不再谈判，一切责任由国民党方面承担。蒋介石见后大怒，于10月2日交给马歇尔两条更为苛刻的条件，表示，中共如果能同意，他立即可以宣布停战。

这两个条件不但中共方面无法接受，连马歇尔也连连摇头。但此后，蒋介石就飞往庐山避暑，对马避而不见，马只好同司徒雷登上庐山，10月6日，他们终于见到了蒋。经过长达8个小时的商谈，蒋终于同意停战10天作为中共方面考虑他所提条件的的时间。

马歇尔为和谈尽了力，为共产党赢得了时间，本来是做了件好事。但他却故作聪明地耍了个小阴谋。在对外的公告中，他称休战的目的是为了“讨论”蒋介石的条件，用的是英文“discuss”，但在正式的备忘录中，他却使用英文“carrycut”，意思是“执行”。这样，如果中国共产党不同意蒋提出的条件，

就将授人以背信弃义，破坏和平的口实，这其实是帮了蒋介石的大忙。周恩来对此十分愤怒，拒绝由上海回南京谈判，并指责马搞两面派，要求他立即修改备忘录并公开辟谣。10月9日，马歇尔飞往上海向周解释此事，但二人争论半天仍没有结果，周仍坚持留在上海。

国共双方虽已休战，但拒绝和谈，使得梁漱溟焦急万分。他一面找到国民党当局，力劝孙科等人拿出和谈的诚意，以免做民族之罪人。但孙科十分为难地解释说党内一切大事均是蒋介石说了算，他们实在无能为力，但表示欢迎周前来谈判，他们将尽力而为。之后，梁漱溟于10日赶到上海拜访周恩来，力劝共产党为了和平再作一些让步。他表示周恩来留在上海很不方便，不如回南京谈判，即使不成也不会授人口实，造成共产党不要和谈的误会。周深为所动，答应请示延安后回南京。

为了和谈能顺利进行，梁漱溟又不辞劳苦地找到了许多退居在家的民主人士，劝他们不要逃避责任，而应该站出来说话，为和平尽力。黄炎培等人为梁漱溟的精神所感染，均表示如国共恢复和谈，他们立即前往南京，为和平而奔走呼吁。

在梁漱溟的奔走努力下，事情出现了转机，各方面都有了和谈的意思，他感觉该松口气了。11日晚，

他乘夜车回南京。12日清晨，火车缓缓驶入南京车站。梁走下了火车，成功的上海之行使他不免有带给中国以和平的愉悦，而早晨清新的空气更使他不急着回家，而是随手买了份报纸，准备独享那份“偷得的闲瑕”和成功在即的愉悦心情。不想，翻开报纸后，触目惊心的却是国民党军队于11日下午攻入张家口，蒋介石随即宣布11月12日召开国民党单方面决定的国民大会的消息。局势的急转之下如当头一棒，使梁不由呆立了，良久才缓缓说出了那句令他自己和国人都无法忘却的名言：“一觉醒来，和平已经死了。”

七、最后的努力

局势发展到这一步田地，梁漱溟更觉意冷心灰，回到南京家中后一天没出门，认为已无话可说，无事可做了，“现在的事仿佛是救一个垂死病人，以前或许有一线希望，现在已经断气，实在毫无办法。”

11月12日，周恩来致电中共中央，说国民党打下了张家口，又下令召开国大，说明国共和谈已破裂。为争取时间疏散人员，在上海、南京的中共代表在四五天内保持沉默，而由中共中央出面对国民党表

示严重抗议。因此，从表面上看，上海、南京的中共代表都很平静，看不出和谈破裂的样子。马歇尔、司徒雷登等人不相信梁的判断，仍请梁再想些办法，作些努力。

在马、司徒等人的一再劝说下，梁漱溟不免心动，表示可以试试。但同时提出了两个条件：首先，由于马歇尔与周恩来已经闹僵，不方便再说话了，现在只有由国内第三方面出来努力，希望美方及国民党谅解；其次，国民党方面，由美方出面联系，共产党方面，则由国内第三方面出头。国内外第三方面要一同用力，事情或许还有希望。马歇尔、司徒雷登表示完全同意。于是在15日，梁漱溟便答应做最后的努力。

15日上午，国民党派国民参政会副秘书长雷震到上海，找民盟、青年党的负责人商谈，邀请留沪的政协委员，包括中共代表，都到南京去重开和谈，希望第三方面代表尽力调解。民主人士闻讯大喜过望，国民党方面主动要求和谈，看来和平有望。当天下午，张君勱、黄炎培、沈均儒等人一起到思南路周公馆，劝说周恩来去南京和谈。出人意料的是，周恩来对第三方面人士十分热情，明确表示愿意和谈。

三方面似乎都积极要求和谈，但实际上是各怀各的心思，目的完全不同。作为配角的第三方面的民主人士是真心希望和平，现在正为国共双方的热心和谈

而高兴。而和谈的主角，国共双方都明白和谈无望，全面内战已不可避免。国民党由于战场上的节节胜利而狂妄地认为战场上的胜利只是时间问题，因此开始考虑建设问题，十分希望能争取到第三方面的支持，首先是希望他们能参加11月12日的国大，所以才做出热心和谈的姿态。周恩来对和平已彻底失望，并已经做好撤离的准备，只是碍于第三方面不少人仍抱有一线希望，不好断然拒绝，他在15日致中共中央的电报中称目前的局势是国民党在发动和平攻势，而第三方面怕破裂，也参加了这一和平运动。现在的中心环节是争取第三方面，如能争取到民盟全部或大部分不参加国大就是胜利。三方面和谈的“底牌”都不同，都按各自的想法努力，其结果可想而知。

10月21日，周恩来会同黄炎培、张君勱、沈均儒等人乘坐美军专机抵达南京，稍作体息后，就去见蒋介石。蒋与大家握手寒暄之后就表示自己要去台湾，政府方面由孙科负责，接见不足8分钟就走了。大家都明白，国民党内蒋介石一个人说了算，孙科无法替他作主。他这一走，等于说和谈只是虚设。周恩来此来只是应付场面，所以不以为意。但在场的第三方面人士尤其是梁漱溟却感到更加失望。

中午12时，孙科宴请各方面的代表。梁漱溟即席发言，他警告大家不要为和平恢复而盲目乐观。回

顾过去的10个月，大家都为和平而奔走呼吁，但结果却是大规模内战仍然爆发了。其原因就在于国共两党挟兵自重，而此外又缺乏能与之制衡的力量，故而其他人只能听由国共双方支配。因此，梁提议第三方面应该借助广大的社会力量为后盾真正发挥自己的作用，“必须在矛盾之两力以外，有一奠立和平之力量出来”，“从今天起，第三方面必须自觉认识其责任之重大，而团结一致，采取行动，当真负起责任来。同时国共双方亦要自觉其自身矛盾中，非有超于矛盾之第三力量，则和平不可期，而欢迎第三方面出来”。同时，“全国人更应警觉时局之严重，而以舆论为第三方面作后盾。第三方面除贡献其心思办法外，于必要时应秉持公正态度，对于任何一方之破坏和平者，断然声明其责任，以舆论制裁之”。

这时，梁漱溟已明白国共双方并没有诚意和谈，而剩下的时间也不多了，他已失去了往日的冷静，而陷于了狂燥不安的情绪中，甚至有些偏执狂的心理。他妄想通过第三方面的力量制约国共两党，俨然有“三分天下而有其一”的想法。在之后的第三方面的会议中，他继续发挥这一想法。他提出应该把国共双方的提案都弃之不顾，另外重新拟一个折衷方案。这些大胆的话立即引起了大家的争论，认为根本不可行。但梁漱溟情绪十分急燥，他言辞激烈，态度强硬，不

时拍着桌子加强语气，他立即反问对方：“那怎么办，你说怎么办？”自然没有人能回答上来，梁继续坚持己见：“到了现在，我们只有用第三方面的力量来压服任何不接受折衷方案的一方。我们第三方面的作用就在这里。要不然，我们只好撒手不干。”大家既然无法拿出更好的办法，又说服不了梁，只好决定草拟出具体方案，再来讨论。

会议公推出梁漱溟、黄炎培、莫德惠三人负责此事，三人经商讨后草拟出一个方案共三条，自以为十分公正无私后就交由大会讨论。第三方面匆匆讨论通过后，并没有再找国共双方代表商量，立即清缮出三份，大家联合签各，并分送给国共及马歇尔三方。

梁、黄、莫三人毕竟只是文人而非政治家、军事家，他们自以为“大公至正”的方案其实明显偏向国民党方面。首先，就地停战，就等于承认了国民党连续攻下东北各地、张家口、苏北、山东各地的事实。其次，方案中对共军驻地作了要求，对国民党却没有提。这显然是中共方面无法接受的。

梁漱溟、莫德惠、李璜三人负责送方案给周恩来，并由梁负责逐条加以解释。梁见到周后，首先声明这是最后的折衷方案，言下之意，国共双方都必须接受。不料当梁刚解释第二条时，周恩来脸色骤变，挥手打断了梁的话，说：“不用再往下讲了！我的心都碎了！”

怎么国民党压迫我们还不算，你们第三方面也一同压迫我们？今天和平破裂，即先对你们破裂。十年交情从此算完。今天国民党是我们的敌人，你们也是我的敌人！”周恩来显然十分激愤，泪落声嘶。他用力摔门而出，取来一份电报。这是向中共中央报告说明中共与第三方面约定，今后中共、民盟如有新的打算一定互相关照的记录。周恩来质问梁说：“我是信任你们的，你们为什么不事先关照一声。”说完又落了泪，莫德惠也在一旁落泪。

梁漱溟想起前约，自知理亏，简直是茫然不知所措。幸而李璜说：“不要紧，赶紧把文件从各方面收回来再说。”并保证青年党方面由他负责。梁漱溟如梦方醒，急忙把黄炎培、章伯均、罗隆基三位找来梅园商量。大家一致同意收回已送出的方案。

莫、李、黄、罗等四人急忙赶往孙科家。只见车马盈门，许多人喧喧嚷嚷地向外走，政府方面看来已经对方案开会商讨过了。四人不由心中一沉，赶紧进去，看见孙科、王世杰、陈诚还在会议室，陈诚正手持手杖在一张大地图上比比划划，一见莫德惠等人进来便说：“你们把这样好的地方都给了共产党了，你们帮了共产党的大忙，我不能接受。”莫赶紧说：“你们认为不行吗？还是可以商量的。”黄炎培眼尖，看见原文件还搁在桌上，便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走过

去拿给罗隆基说：“好！既然不恰当，我们再去商量。”说完就拉着其他人快步向外走，走出门外才松了口气。莫德惠更是紧张得连后襟都汗湿了。送给马歇尔的那份，他还没有折阅，比较顺利地就取回了。

原件就这样全部收回，并交给周恩来过目，声明作废，周这才收泪息怒。而梁漱溟也如释重负，并感谢李璜的帮助。因为此时青年党已经依附政府，如果李执意不收回原件或不同意作废，事情就难以收拾了。

梁漱溟本来是为和平尽心尽力，对共产党也是一片好心，但国共双方都认为自己吃了亏，都无法接受这一折衷方案。事实上，方案确实有损共产党的利益，万幸处理得及时，并没有铸成大错。

但梁漱溟也明白这场虚惊之后，共产党方面对他虽不至于有敌意，但也心存芥蒂。他乃至整个第三方面也失去了调解人的作用。更何况这段曲折使他感叹自己在政治方面的无能，不免意冷心灰，下定了脱离政治的决心。大家明白他去意坚决，也不便多劝。于是，在与各方告辞后，梁漱溟离开南京赴重庆，回到他向往已久的学术研究中去了。

第十章 只发言，不行动

一、宪政不适合中国

早在1941年，中国抗日战争形势有所好转之时，梁漱溟就开始从文化角度思考中国所以不能强盛的原因，只是因为连年战乱，之后又忙于调停国共矛盾，无法深入。此次脱离政治，使他得以继续先前之课题。11月，他辞去了民盟秘书长职务后，回到重庆北碚创办勉仁书院，一方面讲学，一面潜心研究，希望从文化角度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并着手写作他考虑已久的问题——《中国文化要义》。

梁漱溟基于他的新儒家的角度，重新研究了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传统社会结构，自以为找到了中国何以前期辉煌、强大而后期却落伍于世界潮流的原因。他又比较研究了西方文化、中国文化和印度文化，认为中国文化自有其特殊性，其未来的发展前途也自成体系，不能盲目地效法西方近代已走过的路。

通过对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社会的分析，对中、西、印度三种文化的比较研究，他更加坚信自己过去对中国未来光辉前景的判断，从而得出了一贯认为

却不敢确定的结论：宪政不适合中国的国情，如果硬性模仿西方民主的形式，实际并不能给中国带来民主，反而将引起混乱和灾难。

1946年11月12日，国民党政府不顾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的反对，单方面决定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并通过了《中华民国宪法》，并宣布于明年12月25日起施行。1947年3月15日，国民党在南京召开六届三中全会，研究如何促进宪政、做好行宪工作。6月13日，“选举总事务所”在一片反对声中成立，11月，又成立了所谓国民大会筹备委员会和选举指导委员会，并匆匆在各地举行“国大”代表选举。

对于国民党的为制造民主、和平假象而匆忙推行宪政的拙劣行径，梁漱溟深不以为然，戏称之为“选灾”。但他既然已声明退出政治，就不便针对国民党政府发表攻击，于是利用学术问题为掩护，从文化角度说明中国目前并不具备推行宪政的条件。强制推行，不但不能给中国带来民主，反而会给人民带来人为的灾难。总之，中国既然不适合走宪政之路，就不必勉强去走。

梁漱溟的与众不同的见解，使忙于行宪的国民党大为恼火，但苦于梁漱溟乃是借学术探讨的幌子，不好在政治上进行反击。但在文化界中，却引起了相当

大的反响，引起张东荪、郭叔士、费孝通等人著文讨论。他们虽然同意梁的中国目前不具备推行宪政的条件的论断，但否认中国不适合实行宪政的说法，认为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平的实现、人民的觉醒与开化，中国一定会走上宪政之路。

对于张、郭等人的批判，梁漱溟不愿作答。他声明，自己的《中国文化要义》即将完成，大家可以由此书明白他的真实想法和具体主张，他就不一一作答了，大家如有疑问，可以看书。

二、只发言，不行动

梁漱溟虽然远离政治，埋头著书立说，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对政治漠不关心，他十分固执地相信自己的见解和主张，自然也就相信中国的建设与发展必须依靠他才能顺利进行。因此，他总是忍不住要去关注现实政治，忍不住要去说出自己的见解和方案，以供国人参考。

基于以上考虑，他在1947年1月1日重庆《大公报》上发表了《政治的根本在文化》，指出，要解决政治问题不能就事论事，而应该从政治的根本

——文化入手，才能真正解决问题。3月1日，梁在《观察》上发表文章，指出中国问题要解决，必须先解决每个中国人思想中的劣根性，即必须“树立自己信用”，“力求彼此合作”。

1947年5月，国民参政会最后一次会议在重庆召开。梁漱溟的许多老朋友都希望参政会元老梁漱溟能够参加。梁的老朋友、素有“和平老人”之美称的张澜亲往勉仁书院邀请梁。梁漱溟出于对张的尊敬，加上在重庆办学也得到过老人的许多帮助，便答应了。但他同时声明了自己的原则，即只发言，不行动；只呼吁和平，不奔走和平。从此，梁漱溟在学术研究的同时，又以“明知不可而为之”的心情同张澜、黄炎培、许德懋等人一道为和平大声疾呼。

当时，国内形势已随战争的发展而日趋明朗，国民党在战场上节节失利，而共产党不但夺回了过去被侵占的解放区，而且正着手于全面反攻的准备。军事的失利使国民党当局在政治上加强了高压的政策，蓄意迫害敢于反对自己的异己。

民盟是第三方面的中坚组织，向来就敢于发表自己的真实想法，对于国民党的黑暗统治也不时发表文章指责、规劝，故而早被国民政府视为眼中钉。于是1947年秋，国民党当局就着手准备，蓄谋解散民盟。张东荪得知此消息后，立即致函梁漱溟，认为梁

系民盟之元老，希望他能为保住民盟做些努力。出人意料的是，梁漱溟反劝张看开些，既然民盟已经起不到什么作用，不如解散算了。并同时将此意奉告张澜、黄炎培等民盟负责人。

10月27日，国民党政府内政部以民盟“勾结共匪，参加叛乱”为借口，宣布民盟为非法组织。11月6日，民盟主席张澜签名发表中国民主同盟被迫解散通告，通告全体成员即日起一律停止政治活动，民盟总部负责人总辞职，总部亦于即日解散。梁漱溟立即在《大公报》上发表声明退出组织。

梁漱溟这些出人意料的言行使得大家十分不解，甚至有不少人责怪梁变得软弱，失去了昔日的铮铮铁骨、浩然正气。梁漱溟自有苦衷，但有口难言，感觉很委屈。多年后，他回忆此事时解释说，自从发生那件“最内疚”的事使他退出政坛后，他一方面感到惭愧，一方面也不免对共产党产生戒心，因而心情很复杂。“我知道国民党是不行了，今天唯一强大势力将在共产党。过去我祈求国共合作，主要是对国民党而说话，今后将须对共产党说话。共产党是不好说话的，说话不对他的意，就可以被认作敌人。而一径遭到敌视，虽有善言亦难邀好的考虑。只有明白摆出来：我止于说话而不继之以行动，止于是个人而无组织为后盾。那么(没有力量)不足重视，亦不引起敌视；他就

可以放平了心听我的话，对我的话才听得入。这便是我的一番苦心。”或许，这就是梁漱溟只发言不行动以及主动退出民盟的原因，他并不是要以此讨好国民党，而是去刻意迎合共产党，从而有更好地发挥作用。

三、畅所欲言

梁漱溟清楚地认识到，作为独立的、在野的知识分子，在任何当权者眼中都是一种叛逆，将来共产党执政，怕是更难容他说话，但他的性格又不允许他去依附于当权者，去说一些违心的话。他已经意识到他在生命的未来岁月中无法避免的悲剧。虽然已为此只发言而不行动，并脱离了组织，但在发言时仍然无所顾忌，畅所欲言，透露出高度坦达的儒者风度。

1949年1月20日，蒋介石因众叛亲离、四面楚歌，只好通电下野，让位于李宗仁。当天的《大公报》上就发表了梁漱溟早已完成的长文《过去内战的责任在谁？》。文章政治倾向明显，在历数众多事实后，梁明确指出国民党特别是蒋介石必须承担挑起内战的责任。该言辞极富挑战性，在当时国民党仍具强大势力的环境中，不能不说是十分大胆了。特别

蒋介石虽然下台，但在党内势力未倒，实质是“垂帘听政”的太上皇。梁的亲友都为他的生命安全担心，梁自己却毫不在意，结果他并没有出什么事。

李宗仁新官上任，立即展开“和平”攻势，表示“决本和平建国之方针，为民主自由而奋斗”，并声称愿意就和平问题与中共重新谈判。他指派邵力子、张治中等五人为和谈代表，并电邀李济深、章伯均、张东荪等民主人士充任调解人。对梁漱溟也再三邀请，但梁都婉言拒绝，只是向李宗仁提了一些建议，同时劝李也应随时准备引退，不要做蒋介石的替罪羊。

历史是公正的，它再次重演了过去的一幕。不过此时和谈主动权已掌握在中共手中，对于李宗仁的和平攻势，中共一方面表示了宽容，一方面又坚持原则，提出了八项和谈条件，其中就包括惩办战犯问题。

对于中共方面的要求，国民党方面表示难以接受。梁漱溟也不满意，他认为如果不谈战犯问题或许更容易达成和平协议。他又一次出来畅所欲言，以期解决和谈中的难题。

首先，梁漱溟满腔愤慨地责问国民党当局：“试问连续三年大战，烽火蔓延数百万方里，前线将士死多少？战区无辜人民死多少？全国各界直接间接所受苦难者有多少？……今天一旦你们打不下去，又由你们嘴里说要和平。……把国家害到如此地步，把人民

害到如此地步，即不说罪，亦是莫大过失。你们对这过失，竟不负责吗？然而一提到和平条件，你们什么都可以让步，独只有你们自身不容损伤一点，战犯问题不能接受，好像天下人都有罪，只你们无罪！好像天下人都该死，只有你们万万死不得！好汉做事好汉当，你孙科如果有勇气，应当向国人请求把一切罪过一人承担起来，自杀以谢天下！”

之后，梁漱溟则话锋一转：“我倒不主张由共产党把一切国民党人捉来审判治罪，事实上亦捉不到，而且，这么做好像一切是非皆随胜负而定，成则诸侯败则囚，亦没有意味。”随即，梁漱溟提出了三条具体建议，要求国民党要员引咎辞职、闭门思过；共产党也应停止内战，同时也应为内战之发生负责；公推公正人士公开审判，即为定讞。

梁漱溟不自觉中又重演了前次折衷方案一事中的角色，置国共双方的方案于不顾，另立自己的方案。他出发点是争取和平，但在中共看来，无疑是替国民党开脱罪责；而国民党又认为他站在共产党的立场上讨伐自己。梁漱溟自以为不偏不倚却招至双方的怨恨，这何尝不是中国知识分子议政所固有的悲惨结局。梁漱溟又何尝不明白这些，只是他一旦认定自己正确后就一定要说出来，这正是中国知识分子议政的悲惨结局的症结所在。

事隔不久，梁漱溟又发表了《敬告中国共产党》，“郑重请求中国共产党，你们必须容一切异己者之存在”，“千万不要重蹈过去国民党的覆辙”，要求纠正对中间路线和自由主义者，即他这种人的批判。并要求共产党放弃武力，称“若以旧日‘替天行道’的观念来革命，那是不懂革命的”。如果中共坚持使用武力，即使统一全国，也不会有真正的和平。一言可以兴邦，一言也可以毁国。梁漱溟的话或许有些道理，但显然已失去了客观和冷静。他公开袒护国民党不算，还对共产党的革命理论公开讥讽，称之为“替天行道”，在当时的形势下，的确起到了很大的负作用。

出于对梁个人的尊重与爱护，共产党并没有追究此事，只是不闻不问，不听取他的建议。但在学术上，立即有不少左翼人士对梁进行反判，指责他不懂马列而对社会主义、对共产党妄加评论，其态度是不科学的，也是不负责任的。这击中了梁漱溟的要害，因为这句话正是他经常用来批评别人的。他顿时哑口无言，知道再说什么也没有用，便声明自己三年内只发言不行动，不在组织中。同时拒绝了中共请他参加新政议的邀请，退回到重庆勉仁书院的书桌旁，继续他的文化研究。

第十一章 获得新生

一、由沉默到支持

“宜将余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狮突破长江天险，一路势如破竹，高奏凯歌，终于将国民党反动派赶到了台湾，从而统一了全国。

中国共产党胜利使得梁漱溟多少有些尴尬，他虽然并不对共产党抱有敌意，但对共产党的理想、主张却不以为然。再加上两次国共和谈关键时期他都扮演了并不光彩的角色，实际上站到了国民党的一边。使他内疚之余不免对共产党深怀戒心。因此对于新政权，梁漱溟始终保持沉默，既不反对也不支持，而是闭门研究，以静观其变。

但共产党却没有忘记他为革命所做的贡献。1949年10月1日，在举行开国大典的庄严时刻，周恩来对欢聚在天安门城楼的各界朋友感慨地说：“今天梁先生没有来，很遗憾。”毛泽东也有同感。他指示有关部门务必把梁漱溟请到北京，共商建国大计。梁漱溟接到毛泽东主席亲笔的邀请函，欢迎他参加新

政府。梁表示：“如参加政府就不便说话”，坚持不就。

1950年元旦，梁漱溟再次接到中国共产党邀请他参加全国政协的电文。是否出山，他一时拿不定主意，但决定先停办勉仁书院，到北京看情况再定。于是，他又回到了已阔别25年之久的北京，住在西城区劈才胡同南宽街一亲戚家中。

梁漱溟到北京时，毛泽东和周恩来正在莫斯科访问未归。3月10日，中共代表团返回北京，梁漱溟亦被安排去迎接，而且排在民主人士欢迎队伍中的头一个。毛泽东下火车后，很快就发现了梁，老朋友阔别重逢使两人都很高兴。毛泽东尤其显得兴奋，握住梁的手摇个不停，并当场对梁说：“改日来我家做客长谈，再来一个通宵也行。”二人之间并没有发生梁当初所想的尴尬局面，而且毛泽东的热情使梁漱溟大受鼓舞。

11日晚，政府举行公宴，梁漱溟也应邀出席。他仍坚持食素，不饮酒。毛泽东大为钦叹，笑着对众人说：“梁先生坚持素食，清心寡欲，定长寿也！”宴后，毛邀请梁明晚到他家中做客。

12日下午，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也是梁漱溟的老朋友林伯渠驱车亲往梁家将梁漱溟接到中南海颐年堂毛泽东的住处。宾主寒暄入座后，毛泽东开门见

山地问梁对当前国事有何见教，梁漱溟也直言不讳地谈了自己的主张和看法。两人仿佛又回到延安窑洞，相谈甚欢。

不过，毛泽东突然话锋一转，问道：“梁先生这次到了北京，可以参加我们政府工作了吧？”梁漱溟十分为难，但最终仍以一贯的立场推托了。当时的气氛略显紧张，两人都不知道谈话该怎样继续，都沉默不语。为打破僵局，毛泽东立即吩咐开饭，梁漱溟忙道：“我是食素的，有一两样菜就成，但你们吃什么自便，不碍我的事。”毛却大声说：“我们也统统吃素，今天是统一阵线嘛！”

饭后，谈话继续进行。毛泽东已明白梁漱溟仍心存疑虑，也不愿再勉强，便建议道：“梁先生过去在山东、河南搞过乡村建设，你可以去看看那些地方解放后有何变化，旧地重游会有益的。然后你再去东北老解放区看看，比较比较。梁先生如同意，具体行程由李维汉、徐冰安排，他们会通知地方政府接待您的。”

参观考察正是梁漱溟目前想要做的，他也明白毛泽东同志的一番苦心，就痛快地答应了。1950年4月，梁漱溟开始了对山东、河南和东北各省的考察。一路的所见所闻，使得梁对人民政权的认识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亲眼看见许多新气象，使我不由暗自点

头承认：这确是一新中国的开始！”这种新气象随处可见，反映在各方各面，“特别是外省比北京多，在农工百业上较政治上多，”“最基本的就是我看见许许多多的人简直是死，现在竟又活起来。”同时，对于新中国的前途，他也充满信心，“有痛有痒、好恶真切，这便是唯一生机所在。从这一点生机扩大起来，就有今天广大局面的鲜活空气，并将以开出今后无尽的前途。”

9月中旬，梁漱溟结束了他的考察活动回到北京。23日晚，毛泽东邀梁到家中，询问考察的情况和感想。最后，毛又建议梁到南方去看看，趁热打铁，收获会更大。梁明白毛泽东是怕他仍然没有转变看法，立即表示感触很多，想挤出点时间写出来，南方之行就暂缓。同时，他又直率地提出，鉴于新中国的光辉前景，他愿意放弃三年不出的誓言，参加到政府工作中。毛泽东不由哈哈大笑，二人以茶代酒，庆祝梁的转变。

1951年，梁漱溟正式出任政协全国委员，参加了政协会议，从此全心投入到新中国的建设中。他的家也在毛泽东同志的亲自关照下，搬进了颐和园石舫附近一所环境幽雅、小巧精致的四合院中，生活条件大为改善。

至此，梁漱溟已经真正站在中国共产党一边，开

始为新中国建设而努力。从而实现了他生命历程中的一次重大转折，由沉默走向了支持。

二、思想转变

梁漱溟尽管在政治上认同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并积极参与政府工作。但在思想上，却仍坚持自己的一贯主张，并没有转变。

1951年冬，《光明日报》为庆祝元旦征文，专函请梁漱溟写一篇赞美中华民族的文章。盛情难却之下，梁写了《中华民族是人类的一奇迹》的文章，主要延呈了他于1年前出版的《中国文化要义》的思想，宣传自己的中国文化特殊性的主张。但文章发表时，《光明日报》却加上了“梁先生欢迎大家展开讨论”的编者按，编辑出于什么目的并不清楚，但却引起了一场并不愉快的争论。

在看过梁的文章后，许多人写文章进行批判，这场争论涉及梁漱溟思想体系的各个方面，而且有的带有极强的现实政治色彩，可以说是建国后第一次对梁的新儒家思想的清算。

但这场清算的主角梁漱溟此时却已离开了北京。

原来，1951年春，中央组织了西南土改工作团，本就极关注农村问题的梁漱溟想起毛泽东希望他考察南方的建议，于是主动报名参加。5月上旬，他随工作团来到四川合川县。工作团考虑到他年纪较大，没有安排具体工作，而是请他仍住在县城里。

梁漱溟自然不满意这种安排，他同随他同来的黄良庸商量，既然来了，就不能只当旁观者；要求深入下去，参加实际土改工作。他们的要求得到部分满足，被安排在云门镇一家地主宅院里。梁漱溟不顾年高体衰，亲自参加贫雇农诉苦会，参加清算地主斗争会，参加分田地、发土地证等工作，并多次同农民促膝交谈，对土改有了深切的了解。

8月30日，土改工作结束，梁漱溟随工作团回到北京。9月3日，毛泽东听说他返回后，请他吃饭谈心。在谈到此次四川之行时，他颇有感触地说，共产党解放四川不到两年，就把一个很乱很复杂的地方治理得井井有条，很快形成安定局面，情况变化之快，实在出人意料，不能不使人表示由衷的钦佩。因此，他认为土改政策反映了广大农民的要求和愿望，很必要，也很及时。同时，他也批评了亲眼所见土改中出现的违背政策的现象。比如：斗争会上打人很凶，有的地主甚至被逼得跳河自杀。他希望这个问题能引起政府的注意。如果使地主感到自己没有活路，后果总

是不好的。毛泽东笑着说：“你说的情况别的地方也有发生。但我们总的政策是斗倒地主，给他出路。大多数地主不会自杀，也不致于反抗。问题是贫雇农受苦受压多少年了，怒火一点着，就难以控制，于是对地主非打即骂。我们应该认真贯彻政策，努力说服教育农民，关键是土改工作队的干部。只要他们能执行好土地政策，就出不了大的偏差。”

在北京两年多的所见所闻，特别是参加土改的社会实践，使梁漱溟似有所悟，自己却并不清楚是什么。他开始结合思想实际认真阅读马列主义著作和其他一些理论文章，对社会主义和共产党的政策有了较深刻的理解，思想上也有了转变。这个转变在别人看来或许不大，但在他而言已是“打破记录”了。

1951年10月5日，梁漱溟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一篇长文，题目是《两年来我有了哪些转变》，历数自己自1950年1月以来种种思想的转变，其实也是对上次思想清算的正面答复。他写道：“直到1949年全国解放前夕，我还是自信我的对。等到最近亲眼看到共产党在建国上种种成功，夙昔我的见解多已站不住脚，乃始生极大羞愧心，检讨自己错误所在，而后恍然中共之所以对。现在那个距离确实大大缩短了，且尚在缩短中”。

1952年，梁漱溟又写了长达5万字的《我的

努力与反省》，回顾自己多年来从事社会活动的经历，反省以前的错误见解，阐述自己思想上发生的变化。他郑重表示放弃从前的政治主张，坦诚说道：“假如不是今天有中国共产党革命的成功，我始终会认定我走的是中国革命唯一正确的道路，始终不会发觉自己是改良主义。在今天勘对起来，我之为改良主义，已无可否认。”他承认，自己过去强调中国问题的特殊性是错误的，由此而作出的一系列似是而非的判断是站不住的，“唯其似是而非，所以不革命而自以为革命。同时，对于始终不忘革命的中国共产党虽同情它，却不同意其路线，常抱着一个容纳共产党而修正共产党的想法。我就这样执迷不悟了好多年。”

他自我反省说，自己的思想有三个最大的变化。第一，在阶级、阶级斗争、武装革命是否适合中国国情问题上，共产党是对的而自己错了；第二，他反省自己的“中间路线”，承认中国共产党是中国革命的正确领导者；第三，承认自己过去的乡村建设的主张和作法并不成熟，而中国共产党的土改和群众运动政策都是正确且行而有效的。

作为一名严谨的学者，梁自述的思想变化应该是出于肺腑之言。以他刚正不阿的性格是不会说违心的话的。因此，他也毫不讳言自己并没有完全接受共产党的一切理论，对于自己的见解还仍有保留，“实际

上当时我的思想上仍有若干问题没有解决。例如：如何接受唯物观点，旧日中国社会是不是封建社会……。他自信坦诚是为人之本，因而对自己的思想问题从不隐瞒，决不会为了讨好当局而放弃自己的主张。即使在大是大非的关键时刻仍然不失自信、豁达的儒者风度。

梁漱溟虽问心无愧，但他的态度却并不能得到大多数人的理解。立即又有不少人针对梁的文章进行批判。有的人更把梁漱溟作为旧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例证，指出他的确有一些值得欢迎的进步，但在许多问题上仍顽固不化，改造得并不彻底。这些批判日益升级，甚至从政治立场角度对梁漱溟进行攻击。

幸运的是，周恩来同志为保护梁漱溟而公开表态，称梁每次从各地考察回来后“的确有进步”。而且梁漱溟同毛泽东的亲密的个人友谊也保护了他。那段日子里，梁毛二人接触频繁，并且每一两个月就要深谈一次。这些使得报纸上的批评不得不有所“顾忌”，并没有给梁漱溟构成实质性的威胁。

三、看主席有无雅量

如果说，梁漱溟与毛泽东主席的亲密友情使他在建国后的次次思想清算中得到庇护的话，那么他与毛泽东的交恶就是他悲剧的开始。

1953年9月，由于一件意外事情的发生，使梁漱溟与毛泽东几十年的交情划上了句号，梁漱溟由毛泽东的“座上宾”一变而成众矢之的。

1953年9月8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扩大会议在京召开，梁漱溟以政协委员的资格列席了会议，讨论过渡时期总路线。会议的前两天进行得很顺利，梁的发言中肯、真诚，与会者表示赞同，周恩来也感到很满意。10日散会时，周恩来特别关照梁，请他准备一下，在第二天谈谈自己的意见。

梁漱溟对此事十分认真，他认为将过去的发言简单重复没有什么意思。他希望能谈出些新意，对执政党要有所贡献。于是，他思考了一夜，准备了一篇自以为很恳切、得体的发言。

11日下午，梁漱溟根据自己的准备做了即席发言。他首先表示拥护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对新中国建设中的成绩也充分肯定。接着，他开始对当前实际工

作中不尽人意的地方提出了批评。他指出，“特别是近几年来，城里的工人生活提高很快，而乡村的农民生活却依然很苦，所以各地乡下人都向城里(包括北京)跑，城里不能容，又赶他们回去，形成矛盾。有人说，如今工人的生活在地，农民的生活在九天，有‘九天九地’之差，这话值得注意。我们的建国运动如果忽略或遗漏了中国人民的大多数——农民，那是不相宜的。尤其共产党之成为领导党，主要亦在过去依靠了农民，今天忽略了他们，人家会说我们进了城，嫌弃他们了。这个问题望政府重视。”平心而论，梁漱溟的这番话，完全是出于对共产党爱护的态度，他为农民请命，也是出于他素来的主张。因此在会议的当场，他的批评得到了大家的赞同，政府有关人员也就农村工作中的问题作了答复。

毛泽东并没有出席这次会议，但他密切关注着会议的有关情况。当梁的发言传入他的耳中时，却立即引起了毛的误解。毛泽东是农民的儿子，也是依靠农民才取得了革命的胜利，因此自认为是最了解农民的，不愿意听别人在农民问题上说三道四，尤其是指责他嫌弃农民。第二天的会议上，毛泽东在听取彭德怀关于抗美援朝的报告后，发表了与会议主题不相干的谈话。他说，有人不同意我们的总路线，认为农民生活太苦，要求照顾农民。这大概是孔孟之徒施仁政的意

思吧。然须知有大仁政小仁政者，照顾农民是小仁政，发展重工业、打美帝是大仁政。施小仁政而不施大仁政，便是帮助了美国人。有人竟班门弄斧，似乎我们搞了几十年农民运动，还不了解农民，笑话！我们今天的政权基础，工人农民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这一基础是不容分裂，不容破坏的。

毛泽东虽然没有点梁漱溟的名字，但大家都很清楚他冷嘲热讽的对象是谁。当时就坐在台下的梁漱溟自然更清楚。他对毛泽东指责他“反对总路线”、“破坏工农联盟”的罪名无法接受，感到很委屈和生气，如鲠在喉，不吐不快，他认为有必要解释一番。于是当天晚上就写了一封信，第二天当面交给毛泽东，信中说：“听了主席的一番话，明白实在为我昨日的讲话而发。但我不能领受主席的批判。我不仅不反对总路线，而且是拥护总路线的。主席在这样的场合，说这样的话，是不妥当的。不仅我本人受不了，而且会波及他人，谁还敢对领导党贡献肺腑之言呢？希望主席给我机会当面复述一遍我原来的发言而后指教。”毛泽东似乎无意将事情弄僵，看过信后就约梁漱溟当晚谈话。

13日晚，怀仁堂举行京剧晚会，在演出开始之前，两人谈了二十多分钟。梁要求解除误会，毛则坚持说梁是反对总路线，双方都在气头上，言语间频频

冲突，结果不欢而散。

梁漱溟仍不甘心就此背上反对总路线的罪名。16日，他再次登台发言，复述了几天来的说话，试图证明自己是拥护总路线的。但他仍坚持己见，以为民请命的姿态重提“九天九地”说法，要求多知道一些总路线的具体内容，并一再称自己为“有骨气的人”。这些激烈的言辞不能不对党的高层领导人尤其是毛泽东造成不好的刺激。

9月17日，周恩来在大会上作了长篇发言，他以历史见证人的身份历数了梁漱溟的种种反动言行，并指出在国共两次和谈的关键时刻梁是站在国民党的立场上压迫共产党的，由此可证明梁一贯反动。同时，周恩来还在会场上印发了梁于1949年春写的《敬告共产党》一文。在周恩来发言期间，毛泽东或插话，或发言，措词犀利。

“蒋介石用枪杆子杀人，梁漱溟是用笔杆子杀人。杀人有两种，一种用枪杆子杀人，一种是用笔杆子杀人。伪装得最巧妙，杀人不见血的，是用笔杆子杀人。你就是这样一个杀人犯。”

“梁漱溟反动透顶，他就是不承认，他说他美得很，……比西施还美，比王昭君还美，还比得上杨贵妃。”

“梁漱溟是野心家，是伪君子。”

“梁漱溟没有一点功劳，没有一点好处。”

“你的书没有人看，你的话也没有人听，除非反动分子，或者一些头脑糊涂的人。”

……

显然，毛泽东此时已经失去了冷静，因此他的话语过于感情化，部分已不合事实，对梁漱溟的批判也过于激烈了。于是，何香凝出来打圆场，她首先顺着毛的话指责梁漱溟，随后希望他闭门思过来反省自己的错误。梁漱溟如果顺着何的话表个态，认个错，事情可能会就此结束。但生性倔强、认真的梁漱溟却根本听不进何香凝的话。他自信一生光明磊落、与中共坦诚相待，自然无法接受误解。他要进行解释，以消除误会，却不知越解释事情越糟。

根据会议日程安排，梁漱溟于9月18日下午进行答辩。他刚讲十几分钟，会场秩序开始混乱，有人起来抗议，不让他再讲下去。于是，梁漱溟将目光移向毛泽东，要求主席主持公道。他以挑战的口吻说：“我现在唯一的要求是给我充分说话的时间。我还觉得，昨天的会上各位为我说了那么多话，今天不给我充分的时间，是不公平的。我想共产党总不会如此。我希望领导以至于在座的党外同志考验我，考察我，给我一个机会，就在今天。同时我也想考验一下领导党，想看看毛主席有无雅量。什么雅量呢？就是等我把事情的

来龙去脉都说清楚之后，毛主席能点点头，说：‘好，你原来没有恶意，误会了。’这就是我要求的毛主席的雅量。”

梁漱溟的发言有一明显语病，就是声明判断毛泽东有无雅量的前提是毛承认自己错了而梁正确。这自然得不到毛泽东的谅解，反而更加激怒了毛。他抓住这一点针锋相对地说：“在梁漱溟看来，点头承认他正确，就叫有‘雅量’，不承认他是正确的，那就叫没有‘雅量’，这样的‘雅量’，我们大概不会有。但是，我们这一点‘雅量’还是有的，你梁漱溟的政协委员还可以继续当下去。”

梁漱溟听了毫不示弱，接过话来说：“当不当政协委员，那是以后的事，可以慢慢再谈。我现在的意思是考验一下领导党。因为领导党常常告诉我们要自我批评，我倒要看看自我批评是真是假。毛主席如有这个雅量，我将对你更加尊敬，如无这个雅量，我将失掉对你的尊敬。”

毛泽东回敬道：“梁漱溟是野心家，是伪君子。他不问政治是假，不想做官也是假的。和他这个人打交道是不能认真的。和他永远谈不清任何一个问题，他没有逻辑，只会胡扯。……至于说到批评，应该有两条，一条是自我批评，一条是批评。对你梁漱溟，我们实行哪一条呢？是实行自我批评吗？不是，是批评。”

梁漱溟又顶了一句：“我的意思是说主席有没有自我批评这个雅量……”

梁漱溟话音未断，会场上立即一片混乱，台下有人喊，“不许梁漱溟胡说八道。”“民主权利不给反动分子！”“梁漱溟滚下台来！”……

梁漱溟公开对人们敬若天神的毛主席进行批评，自然激起了与会者的公愤。一片混乱中，梁漱溟的好友陈铭枢不得不站出来替梁解围。他以请教的方式问毛泽东：既然梁漱溟的问题很严重，那么其错误是属于什么性质的呢？如果是思想问题，就应采用耐心教育的方法，不必操之过急。

陈铭枢的发言方式巧妙，不偏不倚，立即使与会者情绪都冷静了不少。毛泽东也顺着陈的话，指明梁的问题十分严重，但仍是人民内部矛盾，属于思想问题。毛泽东已让了一步，但梁漱溟却不满意，他自信并没有问题，所以仍坚持不下台，要求继续发言。毛泽东以缓和的口气说：“梁先生，你今天不要讲长了，给你十分钟，讲一讲要点好不好？”梁漱溟说：“我有很多事实要讲，十分钟怎么够？我希望主席给我一个公平的待遇。”这样，全场又一次哗然，许多人接连发言，对梁漱溟的态度表示愤怒。毛泽东再次提议让他讲十分钟。梁漱溟此时如果冷静一些，就应该明白毛泽东一再让步，准备将此事就此了结。无奈满怀激愤的梁漱溟仍

在计较周的发言和毛的批评，坚持要求“公平的待遇”。于是大会采用举手表决的方式决定，结果，除毛泽东等少数人举手同意外，大多数表示反对。就这样，梁漱溟只好走下台。

四、闭门思过

梁漱溟与毛泽东的争论似乎就这样结束了，梁漱溟并没有受到任何正式处分，政协委员照样当下去，工资也照发，但梁漱溟内心的沉重和痛苦却是可想而知的。

他虽然自信光明磊落，但此事发生后，他也不再那么坦然。事后不久，梁漱溟便去信全国政协主席陈叔通，要求请长假以闭门思过。得到同意后，他就在家读书学习，反省自身，再不愿参与任何活动。

最初的几天，梁漱溟十分苦闷。他明白，毛泽东主席既然说这番话一定自有他的道理，决不会是空穴来风。但他三省其身，却百思不得其解，自己善意的批评何以招致毛、周等领导人如此恼怒？问题的症结是什么呢？

9月20日星期天，梁漱溟的两个儿子培宽、培

怨回家看望父亲。梁漱溟便将这场意外风波告诉儿子，想听听他们的意见。培宽思考一会儿后对梁漱溟说：这件事表面上看很意外，是由偶然因素引起的误会。但偶然因素和个人因素却不是主要的，这件事有其发生的必然性。

梁漱溟听得有理，连连点头，于是培宽继续往下分析：这件事有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只是您没有意识到而已。记得1950年，您初选为政协委员时，就开始提种种意见了。参加西南土改工作时，亦曾说要看看西南土改是否合于中央土改法的话。除此之外，您三年来的发言、信件听说也差不多，都好像有种监督政府的心态。您总说自己是善意的，是爱党、爱政府，但一言一行的实际效果如何呢？何况动机恐怕也有问题，您自己好像总是站在政府外面一次次刺激政府，积重难返。毛泽东认为您有恶意，便不足为奇了。

梁培宽并没有就事论事，而是抛开其父与毛泽东之间的孰是孰非，从第三人的角度开导梁漱溟。这些话更是出自最亲近的人之口，自然引起梁漱溟的思考，使他“思路上一心情上根本变化，对于自己错误之所由似乎顿时有所发觉，好像通了窍”。

既然找到了问题的症结，梁漱溟开始认真反省自己的思想和三年来的言行，两天之后，就着手写检讨书。他写道：“正是我的阶级立场的不对和对待中国共产

党认识方面历史上存在的偏颇，造成了我于9月18日达到顶峰的那场荒唐错误。……我这种目空一切，置许多人热爱共产党、毛主席的心情于不顾，在大庭广众之下与毛主席争是非，是必定要引起人们的公愤的。因此，别人批我诛我，实在是情理中的举动。”

时隔30年后，毛泽东、周恩来也已故逝多年，当有人问及这段历史公案时，梁漱溟平静地说：“当时是我态度不好，讲话不分场合，使他很为难。我更不应该伤了他的感情，这是我的不对。他的话有些与事实不太相合，正像我的发言也有与事实不符之处，这些都是难免的，可以理解的，没有什么。他们故世10年了，我感到深深的寂寞……”

第十二章 横眉冷对千夫指

一、众矢之的

沉默寡言、闭门不出使梁漱溟不再招惹什么非议，平安无事地度过了1954年。1955年，中共中央的注意力又回到了思想文化领域。1955年1月，中央发出《关于在干部和知识分子中组织宣传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讲演工作的通知》，遂在文化界引起广泛的批判和笔战，思想“一贯反动”的梁漱溟自然无法幸免。

1955年4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展开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批判》，虽没有点梁漱溟的名字，实际上矛头直指梁漱溟，等于下了批梁运动的动员令。5月11日，冯友兰在《人民日报》率先发表了《批判梁漱溟先生的文化观和‘村治’理论》一文，揭开了批梁的序幕。从此批梁的文章铺天盖地而来，金克木、汤用彤、钟守人、艾思奇等文化界名人也纷纷撰文。在短短半年多时间里，十多份权威报刊齐上，发表批梁文章数十篇，声势之浩大也是少有，梁漱溟成了众矢之的。

批判者们使用严厉、尖锐的措词从文化理论、哲学理论、思想来源、乡治理论等各个方面对梁漱溟进行抨击。其中不乏一些严肃的文章以真正科学的态度与梁漱溟做了学术上的探讨。但更多的则是漫无边际的指责和谩骂。特别是对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和他在革命时期的言行的批判,简直是粗暴的定罪。《梁漱溟的四十年》一文中写道:“梁漱溟的立场,就是在我国革命运动的发展过程中,总是站在保守的反革命的一边,而和进步革命的一边作斗争,并且随着阶级斗争的日益深化,梁漱溟的反革命思想和活动,也就是更加明显和顽固。”有的文章还从揭露梁漱溟“家庭出身与反动立场”出发,例数梁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反动表现”,从而得出梁漱溟一贯反动的结论。

平心而论,梁漱溟的思想和立场的确有问题,但他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多年,在革命和建设时期也作出了不少贡献。因此,给他扣上“一贯反动”的帽子,对他的功绩全盘否定,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只是在那个政治斗争激烈的年代,在自上而下的“思想改造”高潮中,“左”的迷雾扰乱了人们的行为,一些人甚至是很修养的著名人士做出错误的举动,也是在所难免,无须过份指责。

只是这场批判闹剧,对梁漱溟而言,未免太不公平。他只有挨批的权利,却无法申辩,因而索性就不再

申辩,甘当静听不语的“反面教员”。他曾在1956年的一次政协学习会上说,“去年一年对我的思想批判,我没有做任何表示,只在一次座谈会上,我曾表示我拥护这一批判运动……有没有抗拒心呢?有的,不过终于克服了它。”

这场批判固然是祸,但沉默却使梁漱溟因祸得福,平安地度过了1957年的“反右斗争”。而几十万知识分子包括曾批判过他的人都带上了“右派”的帽子。这可以说是不幸中的万幸了。

二、思想是烧不掉的

1956年5月16日,毛泽东亲自主持起草并通过了《中国中共中央委员会通知》,即著名的“五·一六”通知,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一场史无前例的十年浩劫由此上演,像梁漱溟这样的“反面教员”,等待他的,又将是什么呢?

面对这场突如其来的“运动”,梁漱溟感到困惑、迷茫。但他仍然保持沉默,和政协的其他同志一样,每天念文件、看报纸、谈心得。当然,所有的心得只能是“坚决拥护”,在没有看清运动的性质和形势之前,

他始终一言不发，以静观其变。

但随着老干部，老朋友一个个被打倒，他无法再无动于衷，忍不住要谈谈自己的看法。6月7日，他在政协学习会上说：“对于时局的变化、发展，我的心情是困惑，难过，常常是事前茫然，事来震惊，事后百思不得其解……我一直是这样的心情，不希望这种事发生，看到这种事，心里很难过……搞了多年的革命、受到党和人民的信仰、已经进入党的领导核心的人，还出这样的大问题，如何理解？不能不纳闷，想不通。说他们是混进来的反革命，还是变质成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都不大好自圆其说。”

参加政协学习会的人虽然大都对文革不理解，但谁也不敢公开讲，而梁漱溟竟然公开为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洗脱罪名”，自然招到不少人的攻击。但命运又一次偏袒了梁漱溟，在对他的批判未形成高潮之时，文革的烈火就烧到了政协机关中，政协的大门被红卫兵查封，对梁“反动言论”的批判也不了了之。

政协学习组既然已停办，梁漱溟就又回到家中继续他的研究。但激进的群众运动已容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8月24日，梁漱溟正伏案疾书《儒佛异同论》，忽听一阵急促的敲门声。门开之后，一群红卫兵蜂拥而入，领头的一位气势汹汹，劈头就是一句：“我们要造你的反！”面对这群稚气未退的孩子，梁漱溟无可奈

何,只好说:“既然是造反,那就各自为之吧,翻抄什么都可以。”

小将们翻箱倒柜,很快将梁家三代的藏书、明清字画、各代名家手札统统搬了出来。除了留下几本马列毛的著作外,一律撕的撕、烧的烧,砸的砸。当红卫兵抱出两大本《辞海》、《辞源》时,梁漱溟急忙说:“这两部书是谁都用得着的工具书,而且是一位外地的学生借给我的,如烧了我就无法物归原主了。”但却无济于事,梁只能眼睁睁看着伴随自己多年的书籍被付之一炬,心疼不已,“造我的反,造我祖宗三代的反,我都忍受下来了,为什么连这两部普通的工具书都不放过?”而梁夫人因气不过说了一句:“你们这样做是犯法的”,立即遭至罚跪和毒打。梁漱溟知道任何辩解都是徒劳,只有表面平静地承受这一切。

破完了“四旧”,红卫兵发现梁宅院落宽敞,正房装有电话,便宣布将司令部就设在正房,命令梁漱溟夫妇立即搬到南面小屋中,每日打扫院内卫生、清洗厕所,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他们还企图扣发梁的工资,后因周恩来总理干预,未果。他们还时常将梁漱溟拉出去游街批斗,梁由此遭受到前所未有的侮辱。

9月21日,梁漱溟第一次游斗归来,拖着疲惫的身躯走进小南屋,不禁感慨万千,家被抄了,所有的字画、书籍都被烧了,特别是那篇已写了一万多字的

《儒佛异同论》也化为了灰烬，值得庆幸的是人还在。他自信“墨写的字可以烧掉，但人的思想却烧不掉”。他决定从现在开始，动手整理自己一生中积累的学问，保住这份无法烧掉的思想。

从此，梁漱溟白天打扫院落、厕所、构思文章，夜晚就躲进小南屋，在没有一本参考书的情况下，仅凭记忆写作《儒佛异同论》。在他那瘦小清癯的身躯里，仿佛蕴藏着无穷的精力。他以每天一千多字的速度，一个月便完成了4万余字的《儒佛异同论》。之后，又马不停蹄地写作《东方学术概观》，而当时，他已是位73岁高龄的老人了。

三、匹夫不可夺志

红卫兵在梁家折腾了一个月后，便去参加“全国大串连”了，设在梁家的司令部也自动撤销。但街道干部又相中了梁宅，强行征用。梁漱溟二话没说就换了房，搬进了一座狭小的房中。

在全国一片混乱的局势下，梁漱溟闹中求静，继续他的学术研究，在相对安宁的情况下过了几年。值得一提的是，他竟然迷上了太极拳，每天清晨都要和许多

老人们一起在公园练习，或许这种讲究以静制动、以柔克刚的中国传统拳法颇合他此时的心境吧。

但这种平静的生活到了73年就无法再维持下去了。10月，江青反革命集团导演了一出闹剧：批林批孔，捎带批判梁漱溟。这迫使梁漱溟再次公开发言，结果是不鸣则已，一鸣惊人，梁漱溟又一次成为批判的焦点。

1973年12月24日，政协召开批林批孔的学习会。会议刚开始，有人就警告梁漱溟：“对政治问题保持沉默，本身就是一种态度，这里面有一个感情问题。”梁漱溟只好表态：“此时此地我没有好多话好说。……毛主席说过，允许保留不同意见。我对当前批林批孔运动持保留态度。至于如何评价孔子，我有话要说，我准备专门写篇文章。但我的文章不能公开发表，怕有碍当前的运动。”

他刚说完，马上有人说：“有话就摆到桌面上来说，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自信光明正大的梁漱溟自然无法接受“搞阴谋诡计”的恶谥。他立即声明，自己的发言很长，不知各位能不能担待。与会者都表示乐于奉陪。于是，梁漱溟便下定了替孔子说个明白的决心。

1974年2月22日，经过充分准备的梁漱溟显得信心十足，已81岁高龄的他衣冠整洁，手提皮

包，神态庄重地走进政协会议厅，而对准备批判、攻击他的人，他却像又登上了阔别十多年的大学讲坛，慢条斯理、抑扬顿挫地讲述他对孔子的评价。

在这次洋洋三万言、连续两天的讲演中，梁漱溟深入浅出，或以无可辩驳的事实为依据、或授引马、恩、列、斯、毛的论述对孔子进行了全面的、现代意义的诠释。

首先，他申明了自己的学术立场：“今天我们应当如何评价孔子？我们，是指今天的中国人。如何评价孔子，就是回头看过去，看孔子在中国文化史上的贡献……孔子本人已不会说话，不会申诉，大权掌握在我们手里，由我们判断，就要负责，要多考虑，而不要不负责任，考虑太少，因而抬高了他，贬低了他。这与孔子无损，与我们则不好，没有尽到责任。”

在一番透彻、全面的分析后，他得出结论：“我的看法是，中国有五千年的文化，孔子是接受了古代文化，又影响了他之后的中国文化的。这种影响，中国历史上的任何一个古人都不能与孔子相比。他生活在前二千五百年和后二千五百年的中间，他本人是承前启后的。”

在举国上下一致批孔的当时，梁漱溟的大胆发言立即轰动京城，引起了轩然大波，也就引来了批梁运动的又一个高潮，大字报铺天盖地，讨伐声不绝于耳。

“身经百战”的梁漱溟显然对此已不在意了，他公开表示：“我不再多说，静听就是了。”之后，他是每会必到，但却沉默不语，只当是耳旁风。

批梁运动在持续了7个多月后，政协决定告一段落，召开一次总结性的批梁大会。9月23日，主持人奉命一再逼问梁漱溟对批判有何感想。梁漱溟脱口而出：“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一时间举座哑然。

等主持人从震惊中回过神来，命其解释时，梁漱溟接着侃侃而谈：“因为一定要我说话，再三问我，我才说了‘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的老话。吐露出来，是受压力的人说的话，不是在得势的人说的话。‘匹夫’是独人一个，无权无势。他的最后一着是坚信他的‘志’。什么都可以夺掉他，但这个‘志’没法夺掉，就是把他这个人消灭掉，也无法夺掉！”其义正辞严、浩然正气竟使众人叹服而无言以对。

第十三章 第二个春天

1976年，臭名昭著的“四人帮”终于垮台了，举国上下一片欢腾，梁漱溟同亿万人民一样，欣喜万分，欢庆“第二个春天”的到来。

但，“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四人帮虽然被打倒，“左”的思想却并没有在人们脑海中消除。其中，最典型的就是真理标准和两个“凡是”的大讨论。

梁漱溟作为政协委员，自然参与其中。他中肯地进言：“中国的历史发展到今天，人治的办法恐怕已经走到尽头。……中国由人治走向法治，现在是个转折点，今天要逐渐依靠宪法和法律的权威，以法治国，这是历史的趋势，中国前途的所在，是任何人所阻挡不了的。”

显然，梁漱溟是坚持真理、反对两个“凡是”的，他还敏锐洞察出了问题的关键而大声呼吁法治。然而，对党、对中国的热爱却被诬为“别有用心”，他被剥夺了议政的权利。特别是《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中赫然收入了《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又给他平添几分压力。有人借学习《毛选》为名，公开点名批判他。

这虽然不能伤害梁漱溟，但使他感到迷惘：四人帮不是被打倒了吗？怎么其影响还没有消除！

1981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第二个春天也真正来临了，梁漱溟由当了30余年的政协委员升为政协常委，并真正获得了议政的权力。其关于法治的建议也得到了有关方面的重视，并出任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宪法修政委员会委员。在生活上，他也搬进了复兴门外的新居，从而有一个较为优越的条件安度晚年。

梁漱溟深感自1979至1987年，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好的九年”。他为自己能在垂暮之年赶上大好时光而兴奋不已。因而，他不顾年事已高，积极投身到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当中，坦陈己见，畅所欲言。

真正令梁漱溟感到由衷欣慰的不是在政治上和生活上，而是他学术的第二个春天的来临。1985年3月，他应邀为中国文化书院筹委会与九洲知识信息中心在北京办的第一期“中国文化讲习班”作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报告。中国文化书院成立后，他被选为院务委员会主席和名誉院长，并多次讲授有关东方文化的课程。在前几年的“传统文化热”中，梁漱溟作为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而再度成为引人注目的文化名人。

在海外，梁漱溟同样有着广泛的声誉。美国、日本、新加坡及港台地区都有他的著作出版：更有人专门从事关于他的研究。美国芝加哥大学历史系凯利教授著有《中国的最后一个儒家——梁漱溟》一书。日本学者和崎博文已将梁著《人心与人生》翻译出版。他还联络日本学者着手出《梁漱溟先生全集》，设立“梁漱溟先生教育基金会”，奖励优秀的中国留学生。1987年10月31日，“梁漱溟思想国际学术讨论会”在北京召开，许多知名学者、教授与会，纷纷发言、著文，对梁漱溟的学术造诣表示由衷的敬佩。

梁漱溟的旧著和新稿近几年也已陆续出版。他最后的巨著《人心与人生》一书由其自费由学林出版社出版，很快又再版。三联书店也将此书在海外公开发行。他的旧著《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朝话》、《中国文化要义》、《忆往谈旧录》、《勉仁斋读书录》、《梁漱溟教育文集》也都付梓发行。山东人民出版社正出版多卷本《梁漱溟全集》，第二卷已问世。

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1988年6月23日，这位著名学者、社会活动家、爱国老人历经坎坷之后终于在愉快充实的心境中走完人生的最后一段旅途，在北京溘然逝世，享年95岁。

生命虽已结束，但问题仍在继续。梁漱溟先生70多年前的视角使中国传统文化有了兼容东西的胸怀，

也给了现代文化以不尽的话题。尤其是他那光明磊落、至大至刚的伟大人格，更值得我们由衷的钦佩和借鉴。